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 普亨通

###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241 期

2017 年 10 月 15 日

\*\*\*\*\*

#### 目 录

#### 【新疆研究专辑之二】

#### 【论 文】

- |                           |         |
|---------------------------|---------|
| 苏联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关系          | 杨 怒、张玉艳 |
|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红军两次出兵新疆及其原因 | 曹 伟、杨 怒 |
| 建国初新疆域名之争及修改地名的历史回顾       | 陈 平     |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若干历史问题思考         | 陈 平     |
| 《中华民族大团结》教材出版的前前后后        | 杜雪巍、曹志恒 |

#### 【网络文章】

- |                                 |              |
|---------------------------------|--------------|
| 从中专到清华园，一个维吾尔族博士的成长和心语          | 吐尔孙·艾拜       |
| 守护家园：警惕“泛清真化”背后的阴谋              | 吐尔孙·艾拜       |
| 双双清华硕士毕业 90 后维吾尔族小夫妻南疆驻村、宣讲的心里话 | 艾斯喀尔·亚森、苏毕奴尔 |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 【论 文】

# 苏联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关系\*

杨 恕<sup>1</sup> 张玉艳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内称“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对它的出现、存在及影响的研究中，至今还有许多问题和争议。新疆分裂势力一直大力宣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一场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号召继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革命传统”。显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已成为分裂主义的一面旗帜。面对这种情况，加强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揭露其分裂主义的性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苏联为了实现自己在新疆的利益制造出来的，它的组建、发展、变化自始至终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虽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后期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这一转变的原因是革命形势的发展促使苏联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必须指出，苏联-新疆关系是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一个特殊领域，研究苏联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的作用问题时，必须放在中苏关系的大背景之下考察。本文基于苏联解密档案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概略介绍苏联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的作用。

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中最为复杂，表现出多主体、多层次的特点。这一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是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关系。1924年5月，苏联与北洋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关系后被南京国民政府继承；第二个层次是苏联政府对中国地方政权的关系，这种关系突出表现在东北和新疆；第三个层次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三个层次之间相对独立，又有许多联系。在讨论20世纪20至40年代的新疆问题、特别是在考察40年代苏联在新疆的活动时，一定要考虑苏联对华政策的这三个层次。整体而言，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对华政策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内容，但是更核心的是苏联的国家利益。这既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基本背景，也是苏联制定和实施新疆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出现主要与盛世才时期的苏新关系有关，所以本文的叙述从盛世才主政新疆开始。

### 一、

盛世才执掌新疆时期，苏联与新疆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33年“4.12”政变后，盛世才实际上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面对经济落后的新疆和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他很快就选择了投靠苏联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当时，支持新疆的亲苏政权成为苏联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内容。为了巩固新疆的亲苏政权，也考虑到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苏联先后在1933年11月和1937年6月两次出兵帮助盛世才消灭了马仲英、麻木提等反对武装。苏联的帮助对盛世才进一步巩固新疆的军政大权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盛世才十分清楚。在苏联提供支持和帮助期间，盛世才或主动、或应苏联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密切与苏联的关系。如1933年12月盛世才与苏联成立了苏新贸易公司，1936年提出了“反帝、亲苏、平民，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之后又在

\* 原文刊发于《边疆与周边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

<sup>1</sup> 作者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1938年8月访问苏联时主动加入联共，并拿到了编号1859118的党员证。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进一步获得苏联的信任和支持，盛世才还出卖了不少国家（新疆）的利益。如1940年11月，盛世才背着南京中央政府与苏联秘密签订了《租借新疆锡矿协议》。虽然协议名称里只有“锡矿”，但实际上是新疆的所有矿产。通过这个协议，盛世才把新疆地质矿产勘探和开采的权力全部交给了苏联，这是一种很明显地出卖主权的行为。当时，苏联在新疆境内的地质勘探工作主要在与苏联接壤的北疆阿勒泰、塔城和伊犁三个专区进行，发现并开采了多种重要的金属矿产，如锡、铀、钽、钨、铍等。

卫国战争开始以后，盛世才在莫斯科战役之前对卫国战争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认为苏联要垮了，遂改变政策投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自1942年4月至1943年秋，盛世才先是在政治上开始冷淡苏联，然后采取了一系列恶化苏新关系的行动，公开对抗、排斥苏联，最终以牺牲新疆与苏联的关系为代价，改善了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同时清除了中共在新疆的组织，使中共遭受重大损失。盛世才的反苏行动迫使苏联在新疆的各类专家、地质队、企业及工作人员，包括“红八团”在内的军队，全部撤回国内，致使苏联在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利益都遭受重大损失，全面恶化了苏新关系。与此同时，新疆的社会经济陷入了濒临崩溃的状态，形势急剧恶化，而国民党新疆当局又无力解决各种危机，遂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这恰好为苏联干预新疆局势提供了条件。在此情况下，苏联决定全面干预新疆以恢复自己的影响和利益。

苏联干预新疆的目标首先是恢复苏联在新疆的势力。盛世才改变亲苏政策之前，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关于这一点，斯大林的德文翻译瓦连京·别列日科夫（Валентин Бережков）曾回忆说，“起初我很惊奇：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文件中，新疆被划分为一个特殊地区并由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坎诺佐夫（В. Г. Деканозов，此人是格鲁吉亚人，与Л.贝利亚关系密切。曾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副局长，是大清洗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Л.贝利亚被处决后不久，也被执行死刑）负责。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中国的这个省实际上是由莫斯科在管理。”盛世才投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并采取排苏政策后，苏联很快丧失了在新疆的大部分利益，这是斯大林不能容忍的。同时，令苏联政府不安的还有，美国开始积极关注新疆事务，于1943年4月在乌鲁木齐开设了领事馆。

苏联对新疆局势进行干预的另一个重要考虑是保证苏联开采新疆的铀矿。1941年10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Л.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西方铀计划的情况。了解到美国和英国在积极进行制造原子弹的工作（分别是“曼哈顿”计划和“管道合金”计划）后，斯大林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开始原子弹的研制。主要工作有：

1.1942年9月28日，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组织铀工作》的2352cc号决议，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苏联境内寻找铀矿，而且迅速开始研究从铀矿中提取铀的技术。

2.1942年11月27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开采铀》的2542cc号决议，苏联地质和国家安全部门把放射性和战略性矿藏资源丰富的中国新疆纳入了工作范围。

3.1943年2月11日，斯大林批准了国防委员会的2872cc号决议，内容是研制原子弹。这个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是苏联著名的核科学家库尔恰托夫（И. Курчатов）院士，政府中的负责人是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

原子弹研制项目开始后，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苏联地质队自1942年9月开始在苏联境内寻找铀矿的工作成绩不大，而在新疆境内的塔城地区勘探到一个铀矿床。但是，苏联早在1942年10月就接到了盛世才要求苏联一切人员（外交官员除外）撤离新疆的备忘录。苏联在经反复交涉无效的情况下，自1943年5月起，苏联地质专家、地质队及家属开始陆续返回苏联。塔城铀矿对于苏联的原子弹计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关于塔城铀矿的确切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证

实。为此，斯大林在 1943 年春没有通过国防委员会、地质、外交等政府机构，直接派著名的纳乌姆·艾廷贡（Наум Эйтингон，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人员，曾成功策划了暗杀托洛茨基的计划，深得斯大林信任。担任过内务部《С》处、即核武器处副处长等职务）去新疆了解铀矿的具体情况。艾廷贡在新疆待了几个月之后，撰写了一份报告直接交给了斯大林本人。报告的结论是：新疆塔城塔尔巴哈台山的支脉中的铀矿是确切的，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艾廷贡的报告加快了苏联干预新疆的步伐（铀矿正式开采后，整个矿区由苏联红军负责保卫，而民族军只能在 6-7 公里之外担任外围警戒，不得进入矿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也无权过问矿区的任何情况）。

在上述目标的驱动下，苏联在从新疆撤出人员和机构、军队的同时，做出了全面干预新疆局势的决定。

## 二、

在苏新关系恶化过程中，苏联曾做出一些努力，希望使关系有所缓和、恢复，但没有结果，于是，在撤出人员的同时，开始了进行干预新疆的准备。这一时期苏联干预新疆的过程大致从 1943 年 5 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主要内容如下：

1.1943 年 5 月 4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全面干预新疆，并做出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疆的决定》。会议指出，“盛世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尽管苏维埃国家帮助了他多年，但他不仅没有珍视这点，反而采取步骤给苏联带来严重损失。因此，认为采取措施把盛世才从该省政权中清除掉是必要的。”“为此，提出建议着手建立‘民族复兴小组’，其成员既有新疆本地居民，也包括拥有苏联国籍且与新疆民族相同民族的人。”同时，“决定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若干所学校，以培训此类小组的领导人 and 宣传干部，而他们要培训新疆居民。”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亚的三个加盟国很快就建立了多所培训学校，负责培训并向新疆派出起义小组的领导人以及对新疆居民进行工作的宣传干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疆的决定》，是苏联全面改变对新疆政策的起点和纲领，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联共（布）中央做出干预新疆决定的时候，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战役已开始酝酿，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斯大林在此时考虑新疆，更证明了新疆在苏联对外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为了落实 5 月 4 日决议，成立了一个新疆工作协调组。成员有：А.柯西金（Алексей Косыгин）——代表苏联人民委员会（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总理）；Л.贝利亚——代表内务人民委员会（时任内务人民委员）；Н.什维尔尼克（Николай Шверник）——代表全苏工会（时任全苏工会主席，并主持国防工业内迁及战略物资分配等事务）；М.苏斯洛夫（Михаил Сусллов）——代表联共中央（时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但已调莫斯科，随后任联共中央立陶宛局特命全权主席）。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5 月 4 日的决议没有军事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派军队一类的事务是由国防委员会或总参谋部来决定的。

2.为贯彻落实联共（布）中央的决定，1943 年 5 月底，Л.贝利亚召开了一个关于新疆的大型情报工作会议。参加人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军事情报部门、边防部队的领导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勒泰边疆区、苏联驻蒙古的情报部门的领导人，以及在新疆的各个情报站的负责人，如伊宁、乌鲁木齐、哈密，包括南疆的喀什、库车等地。会议的宗旨是为全面干预新疆做好情报工作。

3.1943 年下半年，苏联红军总部从西方前线作战的部队中抽调了一批中亚民族，如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民族的军官和士兵到新疆。据资料，在 1944 年 11 月 7 日伊宁暴动之中与之后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主力是从哈萨克斯坦潘菲洛夫市派来的苏联正规军，有几个团的兵力，

而不是起义不久、人数不多的游击队。

4.1944年12月5日，根据Л.贝利亚的命令，苏联内务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任务处，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领导（黑体系本文作者所标示）新疆的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并向其提供帮助”。此时，苏联军队已经进入新疆。这个特别任务处的处长是弗拉基米尔·叶戈纳洛夫(Владимир Егноров)少将。根据特别任务处的部署，阿拉木图、安集延、塔什干等地设立了训练基地，对新疆在苏学习和逃苏人员进行军事训练，作为武装斗争的骨干。后来，叶戈纳洛夫少将兼任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总军事顾问一职。

5.1945年4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正式成立，随即决定从北、中、南三个方向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即“三线攻势”），以扩大“共和国”控制区，而此时大批国民党军队已开始进驻新疆。为了加强民族军的作战能力，1945年6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为了巩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即民族军），向新疆派遣500名红军军官及2000名军士和列兵。这项工作迅速完成，并由内务人民委员Л.贝利亚向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作了书面报告。当时，民族军的总人数约2万人左右，500名军官和2000名军士、列兵大都担任了各级指挥员的职务，从而建立起一套由苏军人员担任主要领导的从师长、团长一直到连长、排长、班长的作战指挥系统。还应指出的是，从伊宁暴动开始，苏联除派出大量军队参与军事行动之外，还提供了大量武器和装备，其中不少是在苏德战场上从德军缴获的。二战期间在新疆出现大批德制和苏制武器，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能是唯一的。苏联的这些援助，从根本上提高了民族军的作战能力。

6.苏联当时的军事、情报、党政文件里面很少使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字，而使用“东突厥斯坦革命政府”、“东突厥斯坦苏维埃政府”等名称。这种称呼，无疑反映了这个政权的特殊背景。

7.由于苏军的再次参与，民族军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很大成果，1946年8月，进军到玛纳斯河西岸，已离乌鲁木齐不远。此时苏联和国民政府已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13日签订），而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对苏联来说弊大于利，为此苏方命令民族军停止进攻。

8.上述一系列决议和行动基本完成之时，1946年8月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Л.贝利亚、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Круглов)、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Абакумов)向联共（布）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由政府奖励内务部-国家安全部行动小组的优秀工作者，（因为）他们胜利地完成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3年5月4日确定的在新疆的任务”。这份报告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苏联干预新疆的计划和行动，也说明了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的重要作用。

从档案资料的内容来看，苏联干预新疆的计划和行动是由联共中央的核心—政治局决定、斯大林批准的，主要目标、基本方针、政策、执行部门都确定得非常清楚。在计划中，莫洛托夫总体负责，并协调党政机关的工作，而情报工作由Л.贝利亚亲自指挥，参与军事行动的有正规军、边防军和内务部队。资料表明，苏军参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44年11月伊宁暴动期间，苏军成建制地越过边界直接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兵种有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和空军。由于苏军参战，国民党伊宁守军被全歼；第二次是在1945年6月开始的“三线攻势”中，由500名军官和2000名军士和士兵组成民族军的骨干参加作战，迅速取得了战场优势。很明显，民族军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对国民党军队的胜利，主要是由于苏军的参与，否则胜利是不可能的。

当时苏联和中国是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如果苏联对盟国进行颠覆的活动被揭露出来，对苏联的形象和利益非常不利，因此，领导和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整个过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档案当年都是绝密级的（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ый）。

1945年1月5号在伊宁召开了一次“东突厥斯坦人民大会”，大会发表了一个国家主权宣言，宣言中明确讲“中国对东突厥斯坦领土的占领已经被根除；已建成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我们要同全世界所有国家、尤其是苏联建立友好关系。”这个宣言明白无误地表示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分裂性质，也说明了它与苏联的特殊关系。正是因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分裂性质，所以现在新疆分裂势力的多个组织都在其纲领等文件中提到这段历史。例如，在哈萨克斯坦成立的“维吾尔斯坦人民党”刚一成立就宣称：要继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前期，在它的管辖地域内，普遍发生了反汉、仇汉乃至残杀汉人的事件，而且不分性别、年龄、身份，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后果。其中，民族军起了主要作用。我们认为，苏联应该对民族仇杀负主要责任。一支实质上由苏联指挥和控制的军队，其重要行动的责任无疑应该由它的指挥者来承担。正是苏联为了掩盖自己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意策划、挑动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仇汉、排汉行动，以此表示“共和国”是由新疆民族矛盾所引起的民族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苏联政策的结果，因而与苏联无关。出于同样目的，苏联安排了有内务部背景的苏籍乌兹别克族人艾力汗·吐烈(Алихан Тюрпе)担任了“共和国总统”。这些事实表明，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精神。

还有资料表明，在苏联武装介入时，俄侨是民族军中人数仅次于维吾尔人的第二大群体。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在新疆的俄侨的情况。帝俄时期，在北疆已有不少俄侨。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军官兵和不少俄罗斯官员、商人等总数达到五万多涌入新疆，使俄罗斯人（俗称白俄）人口大增。苏联在新疆的领事、间谍、商务、内务等机构对这些人做了大量工作，要求他们从事苏联安排的任务，而条件是给他们苏联国籍、工作补贴，以及工作优秀者可以回到苏联等，这对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因此，许多俄罗斯人在新疆为苏联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军中的一些军官就是原白俄军人或官员。实际上，俄侨在民族军中的作用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这也说明了苏联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民族军的影响。

1945年8月13日，《苏中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在此情况下，苏联决定停止“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事行动。先是И.贝利亚签署了《关于停止苏联红军在新疆的积极活动的命令》，接着苏联充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调解人，促使双方开始了和平谈判，并于1946年6月建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在此情况下，苏联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支持并未完全取消，只是在规模上缩减，而各种联系仍然保持着。档案资料表明，虽然新疆开始了和平谈判，但斯大林对谈判能够取得什么结果是很怀疑的，并做好了随时干预新疆的准备。

1947年6月，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三区代表撤回了伊宁。此时，解放战场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延安。面对这种局势，苏联认为中共快要被打垮了，并开始着手准备应对措施。1947年9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制定了《关于新疆的决定》，这一决定“成为新疆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新浪潮的开始”。

下面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苏联再次干预新疆的具体打算。

1947年6月29日，苏联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沙亚赫迈托夫(Ж. Шаяхметов)向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А. А. Жданов)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在政治组织方面建议：“1. 以分散的民族复兴团体为基础并依靠反汉的那一部分穆斯林居民建立共产党，将其命名为‘新疆人民党’，并采用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可的纲领和章程。2.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负责对这个党进行日常的、非公开的政治领导。3.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应与新疆人民党中央在确定的专区内一起开展相关工作。……哈共（布）中央委员会应在与哈萨克斯坦领土相接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专区开展工作。4. ……

应依靠那些已从或正在从各个边境苏维埃共和国派往边界之外的共产党员顾问和教官，合理地建立一个由 15 个人组成的新疆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其成员应来自新疆非常知名的进步的穆斯林权威人士，而且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命运同最近积极参加反汉武装起义的群众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一原则，应首先在伊犁、塔城、阿山专区，而后在新疆所有专区建立新疆人民党各专区委员会。5. 本建议书的第四点应扩大到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和新疆青年联盟各专区委员会。”

上述第 1 点和第 2 点充分说明，“新疆人民党”实际上是联共（布）的分支机构，而“依靠反汉的那一部分穆斯林群众”来建立这个党，则说明联共（布）打算再次利用民族矛盾干预中国内部事务。无论是“新疆人民党”还是“新疆青年联盟”（类似于苏联的共青团），它们的组织系统将完全由联共（布）中央领导，纲领和章程也由联共（布）中央批准。这两个系统将成为联共（布）的一个分支机构或者附属机构。这种做法与联共（布）在策划“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期间建立“民族解放组织”的做法如出一辙，但强度增加了。联共（布）中央对哈共（布）中央这个报告的态度，目前还缺乏档案资料的证实。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迅速胜利，哈共（布）的建议可能只执行了一小部分，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却远未消失。2002 年 9 月在阿拉木图成立的“维吾尔斯坦人民党”就从名称上继承了“新疆人民党”。此外，哈共（布）中央还向联共（布）中央建议，在阿拉木图州东部，就是现在哈萨克斯坦的热尔肯等几个县，单独再建一个州，以使干预新疆的行动更方便。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报告没有涉及军事行动，其原因很简单——军事指挥权在莫斯科，不是哈共（布）职权范围内的事。

1949 年 6 月，在解放战场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商讨建国事宜和建国后两党、两国的关系、苏联对华的援助等事宜，其中也包括新疆和东北问题。在谈到新疆问题时，斯大林表态称，既然中共将很快掌握政权，联共（布）可以出面做工作，让“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集体接受中共的领导。随后，苏联驻新疆各机构开始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命令，推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中共接触、联系，并逐渐接受中共的领导。事实表明，斯大林、或者说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是促使三区革命融入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原因。

### 三、

以上简单介绍了苏联支持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过程。对于这些相关内容，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外的研究还相当不足。苏联解体以后，由于原苏联档案部分解密，一些学者对苏联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关系做了不少研究，揭露出许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史实，有力推动了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些学者的分析及看法，很值得我们重视。下面我们引用几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学者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性质的观点：

“没有苏联方面的积极支持，‘三区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每一次，当起义者们无力前行时，红军部队都会越过边界前来，干完事情后就撤走。”——哈萨克斯坦学者西罗耶日金（К. Л. Сыроежкин）

“可以完全确定地说，苏联领导层不仅在起义的组织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向起义者提供了物质、军事技术和教练人员的援助，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的活动。”“今天可以肯定地说，1944-1945 年起义运动在新疆北部三区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方面提供的积极而全面的援助。”——俄罗斯学者巴尔明（В. А. Бармин）

“1941-1945 年新疆的局势是按特定计划发展的，而这些计划又与民族分裂主义密切相关，

是要脱离中国。苏联在此情况下的政策表现出矛盾性。在（1944 年）这一阶段中，苏联在自己的计划中利用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后，莫斯科和重庆之间找到了一种政治妥协。”——俄罗斯学者卢吉亚宁（С. Г. Лузянин）

“毫无疑问的是，苏联领导层在 1931-1934 年、特别是 1944-1949 年民族解放运动相关事件中的行为明显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俄罗斯学者波里卡尔波夫（И. А. Поликарпов）

“苏联领导人在组织‘三区革命’中的主导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同样的是，起义运动直接依赖于莫斯科的立场，取决于苏联方面帮助的程度和规模，这些对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主导作用。总之，新疆民众在苏联领导进行的一场与中国的政治大博弈中，只是一张可以用来交换的牌。”——俄罗斯学者克拉西里尼科夫（В. Д.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上述观点尽管有所差异，但都认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三区革命）是苏联主导的，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很值得我们思考。毋庸讳言，多年来，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三区革命）的评价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其中，毛泽东所做的“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新疆牵制了近十万国民党军队”、“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等评价，成为争议中的重要论据。我们认为，毛泽东对三区革命的评价是在三区革命融入中共领导的革命之后说的，有其特殊背景，他当时那样讲是对的。但我们也必须指出，毛泽东还多次说过：苏联要在中国搞两个殖民地，一个是东北，一个是新疆。对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同样应该给予重视。

显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一次自主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是苏联把新疆纳入自己势力范围这一项政策的结果。大量参与其中的各族民众，特别是中下层成员，他们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愿望和要求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他们不可能了解苏联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真实目的和诸多具体行动，不能为分裂、排汉等行为负责，但事实也证明，他们并不是这个所谓的“共和国”的主人。

总之，我们认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苏联为了维护自己在新疆的利益，利用新疆各民族、各阶层民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愿望而制造的一个干预新疆事务的工具，目的是恢复新疆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地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完全由苏联策划、领导、组织，并派出了大量人员参与，他们来自军队、安全部门和党政机构等，这些人员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领导和骨干。为了隐藏干预作为盟国中国的事务的目的，避免国际舆论及盟国的谴责，避免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装扮了穆斯林反汉的所谓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的外衣，并使各项行动高度保密。苏联的这些做法，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毫不顾忌中苏两国的盟友关系，对两国关系造成了恶劣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疆分裂主义的发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前期是苏联主导的分裂政权，后期又在苏联的主导下融入了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过程中，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等人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反对分裂和排汉，积极与中共合作，但他们所起作用有限，而发挥了核心作用的，是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一段历史，不确和疑问之处尚多，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深入研究，以加强反新疆分裂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 【论 文】

#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红军两次出兵新疆及其原因\*

曹 伟、杨 恕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红军曾两次出兵新疆，关于这两次苏联出兵新疆的情况，特别是 1937 年苏联出兵新疆的情况国内研究资料很少，而且现有研究成果披露的许多信息相互之间多有出入，甚至一些事件亲历者的说法也存在矛盾。<sup>1</sup>本文主要使用俄罗斯学者巴维尔·阿普捷卡里（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ь）根据俄罗斯国家档案披露出来的资料，对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出兵新疆的情况进行了重新梳理与说明，澄清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苏联在 30 年代的对外战略，对苏联的这两次军事行动进行了分析。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阿普捷卡里引用的大量资料来自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因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重要性。

### 一、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第一次出兵新疆

19 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沙俄对中亚地区的征服行动，其日益介入新疆事务，新疆面临着被分裂的危险。民国以来，孤悬塞外的新疆实现了由满清统治到民国政府的平稳过渡，在杨增新统治时期（1912—1928 年），新疆局势保持了总体上的稳定。在此期间，苏俄建立后一度放弃了对新疆的干涉，曾经应杨增新之约出动红军协助围剿窜入新疆的巴奇赤和诺维科夫两股白卫匪帮，之后苏联红军退回苏联境内。1928 年，金树仁上台以后由于吏治腐败和政策的失误，新疆各种社会矛盾日渐激化，导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最严重的当属 1931 年爆发的哈密农民起义，并导致甘青军阀马仲英（自称“甘宁青联军总司令”<sup>2</sup>）趁乱入疆。新疆局势的混乱，不仅导致了金树仁统治的终结，而且在对抗马仲英的过程中，盛世才在新疆政治、军事舞台上开始崛起。

1933 年 4 月 12 日，新疆首府迪化发生“四·一二政变”，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外逃，盛世才依仗其掌握的军事力量担任了新疆临时督办。盛世才上台之初，他所能控制的地盘仅省城迪化一带。当时，占据北疆大片土地的国民革命军中央陆军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伊犁屯垦使兼新编第 8 师师长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呈三足鼎立之势。在与马仲英、张培元的实力对比中，盛世才无论是在占据的地盘、控制的军队人数，还是在军队士气、后勤补给方面均处于明显的劣势。例如，盛军约 6000 人，马部有万余人，张部有 8000 多人，且马、张的部队多是青年壮丁，而盛的部队多老弱残兵。<sup>3</sup>此外，马、张二人还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在国民政府代表罗文干的游说下，马、张二人联合行动准备随时夺取新疆省政权。

在此情况下，盛世才通过多种渠道与苏联驻新疆外交人员取得联系，并以各种方式向苏联展示其亲苏亲共的政治立场。1933 年 12 月，盛世才在迪化与苏联代表波哥丁签署了一项秘密合作

\* 原文刊发于《西域研究》2014 年第 4 期。

<sup>1</sup> 目前，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出兵新疆的情况可参见以下文献：包尔汉著《新疆五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年；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盛世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著《马仲英逃亡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蔡锦松著《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安德鲁·D.W.福布斯著《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 年—1949 年民国新疆政治史）》，新疆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1991 年，等。

<sup>2</sup> 马仲英的武装后来被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六师。

<sup>3</sup>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年，第 187 页。

协定，该协议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盛世才最终以出卖新疆权益为代价换取了苏联的支持。曾于 20 世纪 30 年代担任《新疆日报》社社长、阿山专区教育局长的周东郊后来披露，1935 年盛世才曾亲口告诉他：“1933 年 12 月派红军一团自霍尔果斯入境，瓦解了张培元的武装；1934 年又派两团红军自塔城入境，解了马仲英的迪化之围，并把马部驱逐到和阗。”<sup>1</sup>很明显，1933 年末至 1934 年初苏联出兵新疆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盛世才剿灭张培元和马仲英势力，特别是解迪化（今乌鲁木齐）之围。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红军此次进入新疆时通过的关卡有三个：霍尔果斯、苇塘子和巴克图，入新苏军当时对外公开使用的名称是“塔尔巴哈台军”和“阿尔泰军”。但是关于此次进入新疆的苏联军队的具体编制情况以及装备情况，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著述中存有不少相互出入之处，巴维尔·阿普捷卡里披露的一些资料可对此提供进一步的说明与佐证。

针对张培元部的军事行动。1934 年 1 月初，苏联格别乌（即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简称——笔者注）的两个旅大约 7000 人在坦克、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越过中苏边界进攻伊宁和塔城。<sup>2</sup>关于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中国学者蔡锦松认为是库米齐（Кумич）将军和沃尔根（Волгин）团长，而且他进一步指出，苏联军队是从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和苇塘子两个关卡进入新疆的，从霍尔果斯进入伊犁的苏联军队对外称“塔尔巴哈台军”<sup>3</sup>，从苇塘子入塔城的称“阿尔泰军”<sup>4</sup>。但也有人认为，有两个旅是从苇塘子入境塔城的，与此同时，还有苏军一个加强团从霍尔果斯进入伊犁，对外称“塔尔巴哈台军”。<sup>5</sup>最终，在苏联红军的沉重打击之下，张培元兵败自杀。1934 年 1 月 20 日，新疆省军开进伊宁后进入伊犁的苏军（应是“塔尔巴哈台军”）才撤离新疆。

针对马仲英部的军事行动。1934 年 1 月中旬，一支 3500 人<sup>6</sup>（另一说为一两千人<sup>7</sup>）的苏联红军携带山炮、野炮、装甲车从塔城的巴克图关卡进入新疆，这支部队对外也称“阿尔泰军”。军中事务名义上由盛世才任命的赵得寿总指挥负责，实际负责人则是苏联指挥官。<sup>8</sup>1936 年赵得寿亲口告诉周东郊，1934 年 1 月苏联三个团从塔城入境，对外称“阿尔泰军”，随红军南下的也有部分真正的归化军。<sup>9</sup>至此，现有中文文献中出现了 3 支所谓的“阿尔泰军”：

名称	苏军进入塔城时间	进疆地点	人数	备注
阿尔泰军 <sup>1</sup>	1934 年 1 月初	苇塘子	两个旅	攻击张培元
阿尔泰军 <sup>2</sup>	1934 年 1 月中旬	巴克图	3500 人	攻击马仲英
阿尔泰军 <sup>3</sup>	1934 年 1 月	未知	三个团	攻击马仲英

目前，根据现有史料尚无法搞清楚上述 3 支所谓的“阿尔泰军”究竟是何种关系？进入伊宁攻击张培元的“塔尔巴哈台军”是 1934 年 1 月 20 日后撤离伊宁的，与其同期进入塔城的阿尔泰军<sup>1</sup>是否返回了苏联及何时返回的，目前尚无法确定。考虑到“塔尔巴哈台军”是 1934 年 1 月 20 日前后撤离伊宁的，阿尔泰军<sup>1</sup>如果撤出塔城，也应在此前后。那么，阿尔泰军<sup>2</sup>与阿尔泰军<sup>1</sup>就不可能是同一支部队，而只能是另一支部队，不过为掩人耳目也叫“阿尔泰军”罢了。此外，

<sup>1</sup>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盛世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年，第 240 页。

<sup>2</sup> [英] 安德鲁·D·W·福布斯著；王嘉琳、胡锦涛译：《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 年—1949 年民国新疆政治史）》，转引自新疆社会科学院“双泛”研究课题组编译：《“双泛”研究译丛》（第一辑），新疆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1991 年，第 61 页。

<sup>3</sup> 关于这支军队的名称来历，蔡锦松认为取自“从塔尔巴哈台招募的归化军”，厉声认为“因为流亡在塔尔巴哈台的一支白俄军队也归这支红军部队指挥”。

<sup>4</sup>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52 页。

<sup>5</sup> 何立波：《苏联红军入疆作战始末》，《同舟共进》2010 年第 7 期。

<sup>6</sup>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55 页。

<sup>7</sup>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中国文史出版，1994 年，第 210 页。

<sup>8</sup>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54—155 页。

<sup>9</sup>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盛世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年，第 241 页。

鉴于 1934 年 1 月 12 日马仲英兵围迪化，盛世才急电莫斯科出兵相救，因此，我们推测苏联攻击马仲英的军队是在 1 月 12 日以后进入新疆的，阿尔泰<sup>2</sup>与阿尔泰<sup>3</sup>可能是同一支部队。上面只是我们的推测，要解开上述谜团，尚需新材料的发现。

1934 年 1 月中旬，从塔城南下的苏联军队——“阿尔泰军”——在迪化附近的头屯河与马仲英所属部队马虎山部遭遇，苏军起初因为轻敌而遭受严重损失。1934 年 1 月 18 日，苏联派出飞机从塔城飞抵迪化轰炸马仲英军队的阵地。当时，参与运输及轰炸任务的苏联飞行员亚历山大·巴尔明（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мин）回忆说：“最后，由驻扎在这里作战的红军指挥部负责这些军火的运输。他们把这些运给督办（盛世才——笔者注）的货物‘送了出去’，把炸弹扔向省府四周聚集的叛军，把飞机降落在围城内的飞机场。我奉命向督办送交炸弹和其他物品的清单。”<sup>1</sup>在此次战斗中，一位参与轰炸任务的苏联飞行员巴雷宁（Ф.П.Польнин）也证实：“省长盛世才请求支援……当飞行至城市（乌鲁木齐——作者）上空时，我们看到城墙附近聚集了很多人。在冲锋的步兵后面是敏捷的骑兵……我们开始降低飞行高度并轮流向暴动者密集投掷 25 公斤重的炸弹。我们看到，暴动者撤离城墙向后跑，附近雪地上的尸体很显眼。”<sup>2</sup>2 月 3 日，从塔城南下的大批红军开到距离迪化 40 公里处的旧机场。8 日晨，红军炮击马军，迫使其从西大桥、水磨沟撤退。至 16 日，马军全部撤离北疆。<sup>3</sup>苏军则乘胜追击，3 月 6 日，由红军和东北军组成的部队，在 15 架飞机掩护下攻占达坂城，大败马军并俘获 200 余人。<sup>4</sup>为了庆祝此次胜利，盛世才专门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并奖赏了所有参战的苏联飞行员。<sup>5</sup>

1934 年 4 月末，“阿尔泰军”撤回苏联，给盛世才留下了配有装甲车和大炮的约千名骑兵以及为盛世才训练军队的几十名军事顾问，其中有名的包括盛世才的高级军事顾问阿吉·卡利莫维奇·马利科夫（Ади Каримович Маликов），还有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日后成为苏联元帅的巴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Павел Семёнович Рыбалко，化名付志辉）。6 月，别克捷耶夫（Н.И.Бектеев）被任命为南方战线的司令，雷巴尔科被任命为他的助手，马利科夫和盛世才要求对雷巴尔科的身份严格保密，而称其为“中国军队中的俄罗斯将军”。<sup>6</sup>马利科夫还帮助盛世才制定了新疆部队的改编和重新部署的计划，该计划不仅得到新疆省政府的批准，而且得到了苏联红军情报局的批准。<sup>7</sup>

苏联红军乘胜追击马仲英到南疆，在南疆的战斗中，在毛兰诺夫率领下，苏联吉尔吉斯骑兵团从伊尔克什塘入境参战，伊斯哈克别克<sup>8</sup>骑兵团也协同作战。<sup>9</sup>在新疆省军和苏联红军的联合打击之下，马仲英败下阵来，并于 1934 年夏由伊尔克什塘前往苏联。在南疆的军事行动结束后，

<sup>1</sup> [英] 安德鲁·D. W. 福布斯著；王嘉琳、胡锦涛译：《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 年—1949 年民国新疆政治史）》，转引自新疆社会科学院“双泛”研究课题组编译：《“双泛”研究译丛》（第一辑），新疆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1991 年，第 61-62 页。

<sup>2</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3</sup>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54—155 页。

<sup>4</sup>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61 页。

<sup>5</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6</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7</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8</sup> 伊斯哈克别克·穆奴诺夫（1902 年—1949 年），柯尔克孜族，生于新疆乌恰县斯木哈纳（现乌恰县吉根乡斯姆哈纳村）。1934 年初，在乌恰成立柯尔克孜族青年为主体的武装部队，后来改编为骑兵团，伊斯哈克别克任团长。1943 年为躲避盛世才的迫害在苏联领事帮助下去了苏联，1944 年回新疆参加了伊宁暴动，后出任三区民族军总指挥，是三区革命的重要领导人。

<sup>9</sup>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62 页。

苏联吉尔吉斯骑兵团和伊斯哈克别克骑兵团留驻靠近苏联的南疆乌恰县。<sup>1</sup>同年 11 月，由四个白俄团和一个骑兵营组成的 2200 人的归化军编入了切尔涅夫（Чернев）上校为指挥官的部队。此外，根据苏联的要求，新疆归化军中的反苏分子遭到了清洗，包括归化军指挥官巴品古特（Паппенгут）上校，取代他的是别克捷耶夫，并很快提升为将军。<sup>2</sup>

## 二、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第二次出兵新疆

尽管苏联出兵帮助盛世才巩固了他在北疆的统治地位，但是南疆地区对盛世才而言依然处在统而不治之下。盛世才的主要政治对手是当时控制和阾地区的三十六师代师长马虎山<sup>3</sup>，马虎山在政治上持亲英反苏的立场，并将盛世才视为苏联在新疆的傀儡。盛世才虽然力图将整个新疆置于自己统治之下，但是限于自己力量有限难以剿灭这股势力，并被迫与马虎山达成了停火协议。

1937 年 4 月，喀什地区的省军第七师（原第六师）代师长阿不都拉尼亚孜<sup>4</sup>举兵反盛，并且派人赴和阾联络马虎山，两军合兵一处，一举攻下喀什回城疏附，马虎山公开发表反盛宣言。由于新疆省军不堪一击，叛军先后攻陷伽师、麦盖提、巴楚、乌什，阿克苏、库车也陷入包围。巴楚被围之后，盛世才只得再次向苏联紧急求援。苏联此次出兵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盛世才平定马虎山在南疆发动的叛乱。关于此次行动，国内现有研究成果披露的信息非常有限，而巴维尔·阿普捷卡里则提供了比较详尽的细节资料。

1937 年 6 月 21 日，根据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苏联红军开始组建 2 支规模不小的军队——“奥什部队”和“纳伦部队”（两支部队的名字来自行军前的集结地点）：“奥什部队”由第 42 山地骑兵团、一个炮兵连、第 19 山地骑兵团的特种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由别克让诺夫（Бекжанов）上校率领的第 19 骑兵团组成；“纳伦部队”由第 48 山地骑兵团、一个炮兵连、第 21 山地骑兵团的特种部队和内务部由谢里万诺夫（Селиванов）旅长率领的第 13 摩托机械化步兵团组成。部队的任务对于士兵和大部分军官是保密的，部队还进行了换装。6 月 25 日，部分指挥官拿到了新疆的地图。<sup>5</sup>

7 月 4 日，上述两支部队的指挥官收到了同样内容的电报：“为部队特制的军装已发去供你们支配，这些军装由部队指挥官亲自分配……不要佩戴星章，总之，不要戴任何有我军军服标志的东西……特别订做的制服上没有印记，其颜色也各不相同。另外，你们应该吩咐每一位士兵将马鞍和靴子上的印记消掉，因为这些物品无法更换，在皮具上的印记处涂上墨水。”<sup>6</sup>

7 月初，苏联中亚军区司令部司令雅库波夫（Якубов）针对部队的指挥提出了自己的作战计划：“空军的战斗行动应该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我们的地面部队和敌军交火之前，由空军单独作战，轰炸巴楚的敌军；

第二阶段：空军和地面部队联合作战，追击自巴楚向南方和西南方向逃跑的敌军；

第三阶段：对被分割的地面部队实施逐个打击，粉碎敌人。

为了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空军必须从卡拉科尔机场起飞，并且必须使用乌什机场，因为机

<sup>1</sup> 1937 年这两个团又参加了平息马虎山叛乱的军事行动。

<sup>2</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ь,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3</sup> 1934 年夏，马仲英离新赴苏联以后，三十六师的指挥权交给了马虎山。马虎山在 1934 年 8 月摧毁了穆罕穆德·伊敏建立的分裂主义政权“和阾伊斯兰王国”。

<sup>4</sup> 该师原师长为和加尼亚孜的旧部麻木提，1937 年 4 月因反盛不克，事迹败露而出逃国外。

<sup>5</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ь,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6</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ь,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群在完成任务后，需要加注燃料以返回卡拉科尔。”<sup>1</sup>

7月12日，中亚军区司令格里亚兹诺夫（И.К.Грязнов）将军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长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Б.М.Шапошников）通了电话，请求提供12架ТБ-3以运送空军作战中所需物资，但是总参谋长建议使用民航的重型运输机АНТ-9和Г-2，谈话中还涉及增加口粮的问题。格里亚兹诺夫将军最终通过民航总局局长解决了调用飞机的问题，民航派出了6架АНТ-9和1架Г-2。与此同时，塔什干部队收到了严格命令，没有莫斯科的命令不得越过边界。7月17日，这些飞机从塔什干飞往阿拉木图，在阿拉木图加注燃料后继续飞往东南方向。7月20日，10架飞机在伊宁附近降落，21日抵达库尔勒。23日，鲁巴科夫航空队对乌什的叛军发动了进攻。<sup>2</sup>航空队在执行任务期间，一架АНТ-9在飞行过程中的一次迫降中坠毁，两架飞机返回塔什干，其他飞机继续向乌鲁木齐运送必需物资，之后在普什涅茨基少校指挥的苏联车队的掩护下从乌鲁木齐撤回库尔勒。

8月底，“奥什部队”和“纳伦部队”越界进入新疆，此前他们已经进行了针对性的军事训练。9月1日，新疆省军在苏联航空部队的帮助下开始向巴楚发起反攻。<sup>3</sup>当天，三十六师的一个旅倒戈，开始支持省政府军，由于该师指挥的另一个旅弃城而去，所以省政府军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喀什。三十六师之后组织的反扑也被击退，至9月5日，该师主力在战斗中被击溃，战斗中在政府军一方作战的飞机有25架，省政府军并于当天占领英吉沙，近3000人投降。9月6日，叶尔羌受到轰炸，当地守军于9月9日投降。9月10日，三十六师的另外两个团也投降了，三十六师不复存在。关于9月上旬的此次军事行动，蔡锦松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当时苏联派出了以康斯坦丁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ов）为总指挥、夏克尔为团长的机械化一个团约5000人，在40架飞机、20辆坦克配合下，从乌恰县的吐尔尕特山口入境，与原驻守于此的毛兰诺夫和伊斯哈克别克两个骑兵团会合，一举打败了马虎山。<sup>4</sup>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康斯坦丁诺夫率领的这支部队与“奥什部队”、“纳伦部队”是何种关系。

马虎山在苏军进至皮山时，弃军逃亡印度。面对如何处理临阵倒戈的原马虎山部旧属马生贵的问题，苏联中亚军区情报处的建议是：“不应该和东干人斡旋，而是消灭他们”<sup>5</sup>。麻木提和马虎山部队中排以上军官被分批送往距离和阗约50公里的卡瓦尔沙漠几乎被全部处死。<sup>6</sup>一位名为诺列科（Норейко）的苏联上校在1937年12月15日写道：“截止12月5日，东干人第三十六师中共有5612人死亡或被俘，被俘的人中有1887人后来被杀。缴获了20门大炮，1门迫击炮，7000多支步枪。维吾尔人第六师中有近8000人死亡或被俘，被俘者中有607人后来被杀。”<sup>7</sup>至1938年1月7日，被俘的第三十六师人员中被杀者增至2192人，第六师增至853人。<sup>8</sup>此外，据周东郊证实，苏联军队还在和阗、喀什设立肃反机关，捕杀中国官员，负责人为康斯坦丁诺夫和

<sup>1</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ь,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2</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ь,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3</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ь,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4</sup>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

<sup>5</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ь,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6</sup> 刘德贺：《马虎山、麻木提在南疆变乱的经过》，载于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3页。

<sup>7</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ь,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8</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ь,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夏克尔，被捕者达 3000 余人，被捕者绝大部分被杀害，红军也参与了此事。<sup>1</sup>受此事件的影响，20 世纪 40 年代三区革命期间，南疆地区维吾尔民众对苏联企图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此的企图怀有深深的恐惧与排斥之情，并导致三区革命未能蔓延至南疆各地。

在南疆的战斗结束后，苏军大部分撤回国内，吉尔吉斯骑兵团的一部分被改编，分驻疏附、和阗，以及中印边界之赛图拉、黑黑孜江干等地。<sup>2</sup>1938 年 1 月 15 日，苏联边境和内卫局长克鲁钦京（Кручинкин）师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建议，在苏军主力撤离之后在哈密部署一支边防部队（一个团），并且在此之前增强新疆的航空中队和坦克中队的力量。<sup>3</sup>该建议后来被采纳。1938 年，苏联红军一个骑兵团和一支空军支队驻军哈密，对外称“新疆归化军骑兵第八团”，当地民众称之为“红八团”。驻哈密的这支苏联部队实际兵力达到一个加强旅：计有兵员 3000 余名，其中步兵 2000 余名，骑兵 500 余名，飞行员及机械师等数百名；飞机 29 架，其中轰炸机 10 架，歼击机 12 架，教练机 6 架，通讯机 1 架；汽车约 150—160 辆；此外，还有坦克、装甲车、摩托车、大炮等。<sup>4</sup>

### 三、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两次出兵新疆的原因

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除了 30 年代苏联两次出兵新疆以外，20 年代和 40 年代苏联也曾数次出兵新疆。在 20 世纪 20 年代，苏俄军队在新疆省政府的许可下两度进入新疆剿灭白俄叛军。杨增新在苏俄红军的支援下，剿灭了白匪军残部，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使新疆避免了一场灾难。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苏联再次出兵新疆策划伊宁暴动，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么，如何来看待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两次出兵新疆呢？笔者认为，应当将苏联两次出兵新疆放在苏联 30 年代整体对外战略的大背景下来考察。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其所坚持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立场出发，包括列宁等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认为，要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解放全人类，而苏联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则肩负着在全世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神圣使命，为了苏联的国家安全也必须大力推动世界革命。列宁曾在《论欧洲合众国的口号》中提出：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军，以帮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摆脱资本的压迫”<sup>5</sup>。苏俄领导人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也曾主张，苏联必须在全世界大力组织和支持革命运动，甚至不惜以苏联本身的安全为代价。<sup>6</sup>1920 年—1921 年，在苏俄的支持下，以米尔扎·库切克汗（Mirza Kuchek Khan）为首的波斯共产主义者在波斯北部里海沿岸建立了吉兰苏维埃共和国（也译作“吉朗共和国”），该苏维埃共和国最终以失败告终。<sup>7</sup>苏联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波兰、波斯<sup>8</sup>的一系列革命军事行动的失败，使它被迫暂时放弃了世界革命论，并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主张。

十月革命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度视中国新疆境内的穆斯林各民族为汉民族压迫下的弱小民

<sup>1</sup>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盛世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年，第 242 页。

<sup>2</sup>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41 页。

<sup>3</sup>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ь,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4</sup>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41 页。

<sup>5</sup> 列宁：《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64 页。

<sup>6</sup> 时殷弘：《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外政策主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 年第 1 期。

<sup>7</sup> Younes Parsa Benab, *The Gilan Soviet Republic and Azadistan in Iranian Azerbaijan (1917-1921)*.

<http://www.iran-bulletin.org/ibMEF-2-completed/TheGilan%20Republic.htm>(2012/4/12)

<sup>8</sup> 1935 年巴列维王朝国王礼萨·汗将国名更改为“伊朗”。

族、将新疆军阀统治定性为殖民统治，并将新疆视为输出革命、扩大世界革命浪潮的重点地区，而且是通往世界未来世界东方革命中心——印度——的最短捷径。共产国际领导人托洛茨基认为，印度的革命工作必须通过阿富汗和伊朗，而新疆是通往阿富汗的必经之路。20年代初，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 Я. Э.鲁祖塔夫（Я.Э.Рудзтак）甚至提议支持“新疆的一些革命团体和组织”摆脱新疆军阀的统治，并在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sup>1</sup>但这一建议经过争论没有获得通过。30年代新疆发生的反对金树仁的武装起义再次吸引了苏联方面的注意，苏联内部世界革命派再次活跃起来。1931年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Bormann）指出，新疆的起义和暴动已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在新疆开展积极的革命工作，帮助运动的发展。<sup>2</sup>但是苏联很快发现南疆的暴动中出现了反苏的倾向，其中也包括大量从苏联外逃的吉尔吉斯居民。苏联对这一地区的武装暴动的支持有可能会引火烧身，因此苏联决定支持新疆省政府平定各地的暴乱。而恰在此时，盛世才表现出来的亲苏亲共的立场引起了苏联方面的关注，并因此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支持，1933年8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下达“对新疆工作的指示”：积极支持盛世才为首的新疆政府，粉碎马仲英和其他回人的队伍；利用归化军稳定新疆政府，并对新疆政府进行监督。<sup>3</sup>

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使苏联将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置于突出的位置。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再度激化，世界革命派认为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机再次降临。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斯基在1931年乐观地预言，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将会比1918—1919年的革命高潮更深刻更广泛地震撼世界，就其规模来说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继续，将会导致无产阶级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sup>4</sup>但是伴随着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国”，之后德国纳粹党的上台和日本军部法西斯统治的确立标志着亚欧两大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德日两国缔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更是直接将侵略的矛头对准了苏联。1934年1月，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把战争威胁的增长摆到首位，苏联也相应地调整了它的对外战略。一方面，防止来自德、日两国的武装进攻。由于德国被苏联视为主要的军事威胁，为此苏联积极谋求与欧洲国家合作建立集体安全机制以约束德国，在远东地区则对日本推行了适度的妥协政策<sup>5</sup>。另一方面，极力避免在苏联的周边地区出现反苏反共势力或亲德日势力。为此，1932年苏联与中国恢复了邦交，1933年苏联与阿富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伊朗、罗马尼亚、土耳其等邻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1935年苏联与蒙古签订了互助议定书。

紧邻苏联的中国新疆地区则在此期间发生了武装起义和暴乱，引起了苏联的严重关注。1933年4月8日，苏联《东方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英日在中国西部之角逐》的文章指出，“英、日帝国主义利用新疆事变实行侵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新疆无论是继续动乱，或形成一个独立国，或形成几个分裂政权，都将是对苏联的威胁，成为帝国主义武力攻击苏联的要塞，对此，苏联绝不能听之任之。”<sup>6</sup>苏联还明确告知国民政府：倘若你们管理新疆，我们不去过问，但是如果你们听任其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话，那我们必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sup>7</sup>值得注意的是，在

<sup>1</sup>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

<sup>2</sup>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

<sup>3</sup>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sup>4</sup> [俄]希里尼扬：《共产国际战略中的世界革命的思想》，〔俄〕《近现代史》1995年第5期。转引自张胜发：《20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3期。

<sup>5</sup> 1932年，苏联承认了伪满洲国政权。1935年，苏联将中东铁路卖给“伪满洲国”。

<sup>6</sup> [英]安德鲁·D.W.福布斯著；王嘉琳，胡锦涛译：《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年—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转引自新疆社会科学院“双泛”研究课题组编译：《“双泛”研究译丛》（第一辑），新疆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1991年，第61页。

<sup>7</sup>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2页。

此期间日本政府确已将侵略的触角伸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和新疆的东部边界，1936年日本的特务机关已经在紧邻新疆的额济纳旗设立了特务机关部，并由江崎寿夫（少将）任机关长。面对新疆盛世才、马仲英、张培元三股势力，苏联虽起初有意接近拉拢张培元，但是遭到了拒绝；马仲英虽有意与苏联取得联系，但关于马仲英的部队里还有日本间谍的消息使得苏联对他心存疑虑<sup>1</sup>，如果情况属实苏联担心一旦马仲英获得新疆的控制权，新疆将会再出现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政权，对于苏联的安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sup>2</sup>；盛世才则适时地向苏联表达了其亲苏亲共的政治立场，并最终获得了苏联方面的好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苏联决定出兵新疆帮助盛世才平定马仲英、张培元势力。马仲英后来虽然去了苏联，但是接替他的马虎山依然坚持反苏反共的立场，这也是苏联不能允许的，苏联再次出兵新疆彻底消灭了三十六师。

#### 四、结语

20世纪30年代苏联两次出兵新疆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如果没有红军来援，盛世才政权在张培元、马仲英的联合进攻下是支撑不住的，也是难以平定马虎山叛乱的。当时身在南疆，并亲眼目睹了盛马大战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在《马仲英逃亡记》一书中指出：“如果盛世才没有向俄国购买飞机、装甲车、机枪弹药和卡车，甚至雇佣那个国家的军队的话，他是不会取得胜利的。”<sup>3</sup>苏联出兵新疆，不仅帮助盛世才迅速剪除了张培元和马仲英等反对势力，而且帮助盛世才统一了新疆全境，避免了新疆可能出现的军阀割据的局面。

在苏联帮助盛世才巩固政权的过程中，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起来，苏联还应盛世才的要求向新疆派出了工作人员，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援助。以此为契机，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影响开始全面渗透新疆，在此后将近10年时间里（1933-1942年），派驻新疆各地工作的苏联专家顾问、驻军官兵搜集掌握了大量关于新疆的各种情报信息，发展了大批亲苏亲共分子。如果没有这些前期的基础，苏联不可能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很快地在新疆策划发动伊宁暴动，并扶植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此外，30年代苏联在南疆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也为其在40年代“三区革命”期间进军南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民国年间，苏联数度出兵新疆，对新疆局势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或者帮助新疆地方政府稳定了新疆的局势，或强行武装介入制造武装暴乱，图谋分裂新疆。联系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苏联出兵新疆的情况，可以发现30年代苏联两次出兵新疆的行动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苏联对新疆的政策逐步由不干涉转变为有限干涉，最终发展到强行武装干涉和策划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30年代苏联两次出兵新疆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目前关于30年代苏联出兵新疆的情况仍有许多不明之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从历史上看，帝俄、苏联一直怀有染指新疆的野心，亚历山大·巴尔明后来也回忆说：“按照斯大林的计划，新疆应当成为苏联独家的势力范围，成为我们的势力在东方的一个堡垒。……除了名字不变，新疆不久就是苏联的殖民地了。”<sup>4</sup>但是我们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尚无将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的野心，也没有策动“新疆独立”的企图。1934年4月15日联共（布）

<sup>1</sup> 据包尔汉《新疆五十年》一书披露，马仲英部队里有一位名为大西忠（化名于华亭）的日本间谍，后被盛世才俘获。参见包尔汉：《新疆五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191页。

<sup>2</sup> 1938年，在苏联边境和内卫局长科姆季夫·克鲁钦师长在他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苏联1937年在新疆的战斗中“消灭了96名日本间谍”，但详细情况没有披露。参见 Павел Аптекаръ, *От Желторосии д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www.rkka.ru/oper/sinc/sinc.htm> (2012/10/8)

<sup>3</sup> [瑞典]斯文·赫定：《马仲英逃亡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sup>4</sup> [英]安德鲁·D.W.福布斯著；王嘉琳，胡锦涛译：《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年—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转引自新疆社会科学院“双泛”研究课题组编译：《“双泛”研究译丛》（第一辑），新疆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1991年，第71页。



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疆问题的决议表明苏联并无派军队常驻新疆的计划：“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阿尔泰军继续留住新疆是不合适的。但考虑到督办（指盛世才——笔者注）的坚决请求和他希望在短期内巩固胜利果实……我们同意将 350 名阿尔泰军骑炮兵留驻在新疆”<sup>1</sup>。但是关于这支阿尔泰骑炮兵驻于新疆何地、以后有无迁移、是否出境等问题尚不得而知。留在新疆的苏联军队也是应盛世才的请求留下来的，这与 40 年代苏联出兵新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考虑是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安全，即使在波兰、波斯推行的世界革命行动也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30 年代以后防止德日法西斯势力渗透新疆等苏联的周边地区日益成为苏联考虑的重点，驻守哈密“红八团”也有防止日本从东面渗透新疆的考虑。而 40 年代苏联出兵新疆，策划伊宁暴动和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则包含着斯大林对战后世界格局的长远考虑和建立势力范围的考虑，虽无直接证据证明苏联吞并新疆的企图，却的确存在着支持新疆的一部分或全部脱离中国的图谋，关于此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sup>2</sup>

## 【论 文】

# 建国初新疆域名之争及修改地名的历史回顾

陈 平<sup>3</sup>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新疆域名出现争论。有人提出“天山省”，有人提出“中国突厥斯坦”“维吾尔斯坦”等等。中央政府毛泽东主席最终坚持清末建省时的域名“新疆”并坚持否定“加盟共和国”苏联模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国策。

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认识新疆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很有裨益。这块国土到底应该叫什么？中华文化讲究名正言顺，这块国土的名字关系重大。至今疆独分裂主义还在“新疆”名称上大做文章，说“新疆”是新的边疆之意，出现在清乾隆时期；因此在清之前这块土地不属于中国。分裂势力称之为“东突厥斯坦”。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苏联历史学家曾有言：中国古代疆土止于长城之内，长城外属少数民族；新疆是新边疆之意。

## 一、新疆名称的由来

新疆古称西域，这个域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公元前 138 年张骞出使归来后，述其经历见闻为《西域传》。西域之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专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则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公元前 60 年，西汉在乌垒（今轮台境内）设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西域都护府设立标志着西汉开始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东汉班超在西域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隋朝裴矩在河西走廊张掖主管西域互市，著《西域图志》，准确记载了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通道，其最西达地中海东罗马帝国。唐朝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迁至库车。唐击败西突厥后，在天山北路设北庭都护府，唐玄宗设碛西节度使，是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安史之乱”后，中原内乱，唐朝崩溃；两宋衰弱，无力西顾，遂失西域。蒙古兴起，

<sup>1</sup> [http://bspu.ab.ru/Faculty/History/orient/h\\_lution1934.html](http://bspu.ab.ru/Faculty/History/orient/h_lution1934.html)（2012/10/8）

<sup>2</sup> 参见杨恕、曹伟：《从哈共（布）中央的报告看苏联对中国新疆政策的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 3 期。

<sup>3</sup> 作者为新疆兵团史志办综合处 原处长。

成吉思汗西征，极大地改变了亚欧大陆的版图和西域各民族的历史。新疆成为成吉思汗后裔东察合台汗国版图。明朝推翻蒙元，收复哈密，控制西域。明不久弃哈密而守嘉峪关。

满清兴起东北之时，天山北属蒙古后裔准噶尔汗国，南部属叶尔羌汗国。十六世纪初，准噶尔汗国灭叶尔羌汗国，统一新疆。清与东扩的准噶尔汗国征战七十多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755年乾隆趁准噶尔汗国内乱之机，出兵击溃准噶尔汗国收复新疆。设伊犁将军节制天山南北。1864年，中亚浩罕国阿古伯入侵，占领南疆并北越天山侵占迪化。1877年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于1884年建省，取左宗棠奏折中“他族逼处，故土新归”之意，定名新疆。然而在维吾尔文译意中是“新边疆”，所以，解放后维吾尔文使用的是音译“新疆”，避免歧义。无论这块广袤辽阔的土地民称有何变迁，其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属于中原王朝的管辖。其后漫长的历史岁月，活动于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少数民族后来也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这是无可置疑的历史。

## 二、解放初期对新疆名称的争议

1944年9月，在伊犁暴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牧民起义，得到苏联军事支持，迅速蔓延到塔城、阿尔泰，史称“三区革命”。1945年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年多后经张治中斡旋改为伊犁地区参政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1948年联合政府破裂，三区代表返回伊犁。国民党军与“三区革命”民族军隔玛纳斯河对峙。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驻军宣布起义，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六军迅速西进，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这块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国土名称出现争议。“西域”显然不可再用，因古西域包括中亚。有人提出“天山省”，但也显然不妥，天山延伸至邻国。中央政府决定仍然沿用清末建省名称“新疆”。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采用音译。

1951年3月，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由西北局民委下达征询意见大纲。据三区革命亲历者、原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任党委书记葛尔夏所著《历史的回声》载：

工作组正要撤离伊宁的时候，突然市内传起一则消息：赛都拉·赛甫拉也夫主持在伊犁召开了“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讨论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具体内容有：一、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面加上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国徽；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千山万水解放新疆很辛苦，应该回关内休息，新疆的治安由民族军负责；四、在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下面设一个维吾尔斯坦共和国观察员等。并说座谈会纪要已上报，但不知报到了哪里。到三月中旬我们工作组回到乌鲁木齐时，已经听到不少人对这条“五十一个座谈会”的消息议论纷纷了。

所谓“五十一个座谈会”受到中共新疆分局及王震的严肃批判，其错误主张被理所应当当地否定了。

## 三、毛主席曾主张在“自治区”前不冠少数民族的名称，其模式为地名 + 自治区而不是现在的地名 + 少数民族名称 + 自治区。

201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合编的《新疆工作文献选编》载，1953年2月至3月，邓小平、习仲勋、李维汉向毛主席、党中央呈送《关于审批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草案的两份报告》。其中披露两种意见：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天山维吾尔自治区。毛主席一开始主张“新疆自治区”，请习仲勋等征求包尔汉、赛福鼎等意见。“包无表示，赛不同意。认为民族区域自治纲要规定民族自治区名称由民族名称冠以地方民称组成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同意了新疆自治区冠以维吾尔的名称。其初衷是中央给西北局的复电“维吾尔族在新疆如同汉族在全国一样，是其他各少数民族的主体民族。因此，必须使维吾尔族干部如同汉族在全国范围内团结、帮助和照顾各少数民族一样来团结、帮助和照顾新疆境内的其他民族。”

1957年8月4日，周总理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

“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可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

其意明显是说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是给新疆十三个民族的（今天是四十六个民族）；不也是不可能给某一个民族的。

#### 四. 新疆部分地名的修改

1951年5月16日，周总理批准了《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纷纷修改地名。1954年2月，新疆省政府决定：乾隆御赐的迪化改为乌鲁木齐；乾德县改为米泉县；景化县改为呼图壁县；孚远县改为吉木萨尔县；绥来县改为玛纳斯县；承化县改为阿勒泰县；镇西改为巴里坤；巩哈县改为尼勒克县。其后，“文革”中在“横扫封资修”的口号中再次掀起修改地名的风潮。

六十多年过去，回顾这段历史，至少可以总结几点认识：

1.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国共产党是真心真意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曾经说过要“代人受过”；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汉族统治阶级还债”的精神，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在建国初期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进疆部队剿匪平叛，大生产运动，土改建政使新的政权很快得到巩固。毛泽东时期是新疆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

2. 党中央，毛主席坚决否定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成立“加盟共和国”的苏联模式，创造性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共新疆分局坚决批判了民族分离主义的错误思潮，坚定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上世纪末，苏联解体宣告了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失败。当然，这只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原因。

3. 近代新疆受周边国家特别是苏联影响很大。建国初期，新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苏联大力支援新中国的建设，中苏签订了友好条约。新疆周边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均为少数民族，斯大林对本国的民族分裂势力也予以毫不留情地打击。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新疆被称为“大后方”，成为新中国的坚实的战略大纵深。但是，六十年代中苏交恶，甚至面临战争边缘。苏联支持和利用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新疆局势出现了混乱复杂的局面，民族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和矛盾。毛泽东尖锐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今天，新疆仍然受周边国家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深受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之危害。

4. 任何伟人任何政党对事物的认识都会受到历史的局限性，都会受到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我国的民族理论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影响；我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深刻；就像不可能有人预料几十年后苏联解体，不可能有人预料到“911”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一样；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三股势力会急剧抬头破坏新疆的稳定；我们对新疆民族问题的认识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阶级压迫被推翻，为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基础；但是，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对待民族问题；更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历史长期形成的，有其发展规律，比阶级问题复杂得多。尤其是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穆斯林观念中第一是伊斯兰教；第二是民族；第三是国家。这与几千年农耕文明没有宗教传统的汉族差别很大。换言之，用汉族思维去看待新疆的少数民族，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是很

容易产生偏差的。今天，新疆的少数民族面临着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长期坚持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祖国的认同感。这对汉族来讲几乎不是问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今天在台湾主张“台独”也是不得人心的。就在新疆修改地名之前，全国都在大改地名。中越边境的镇南关改为友谊关，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善意。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我国予以巨大支援甚至人员牺牲。但是，这一切没有能避免 1979 年的边境战争，直至今日，中越在南海的争执还是十分激烈，战争危机时见端倪。

总之，我国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要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毛泽东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同理，没有民族理论的发展创新就没有新疆民族工作的新局面。要立足我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立足于消除危害民族团结分裂中华民族的各种因素，汲取世界先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推进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好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也才能真正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

## 【论 文】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若干历史问题思考

陈 平<sup>1</sup>

2014 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六十周年。兵团由成立、撤销到重新恢复，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其原因错综复杂。本文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撤销、恢复的原因，试作分析。

## 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新疆的特殊的社会政治地理历史环境，使中央政府必须考虑采取特殊政策。**新疆地处亚欧腹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面积 166.49 万平方公里，陆地边界线 5600 公里。在苏联解体之前大部边界未划定。周边与 8 个国家接壤（苏联解体后），其中 5 个国家主要宗教为伊斯兰教。新疆自清朝重新统一后，百年之间，战乱不断，外寇入侵，分裂割据；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新中国成立初，新疆发生多起武装叛乱，加之内部不稳定因素复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新疆被称为“大后方”，接受苏联援助加快新疆的建设成为当时的紧迫任务。“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成为最合适的选择，既有军队的保卫边疆，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的“兵”的作用，又有加速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民”的作用，组建属于军队序列的生产建设兵团是最好的组织形式。

**其次，是新中国成立国内战争结束，数百万解放军如何安置问题。**1949 年 12 月，毛泽东主席发布了关于军队参加经济建设的命令。1950 年 10 月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延缓了军队大规模转业参加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战局基本稳定情况下，1952 年 2 月，毛泽东又发布了命令（以下简称部队整编命令），将全国解放军整编为国防军和生产部队。该命令最后一段话“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这段话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寓兵于民的战略思想，也最终决定了后来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本质属性：“武装的生产部队（文革中《十二条》）”。

---

<sup>1</sup> 作者为新疆兵团史志办综合处 原处长。

再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驻疆人民解放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必然归宿。新中国初期，进驻部队面临繁重、复杂、艰苦的任务。剿匪战斗、减租反霸、建党建政、改造起义部队等等，最严峻的是 20 万大军的如何生存问题？新疆百年动乱，经济凋弊，民不聊生，被西方探险家成为“中世纪”。新疆农业还停留在“二牛抬杠”的原始状态，生产力极其落后。硝烟未散，征尘未洗，王震率领驻疆部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命令“不容许任何人站在大生产之外”。

大生产运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王震不仅从生产着眼，还从稳定新疆这个全局考虑。“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既是对付分裂主义，也是对付境外侵略者。历史证明了王震的远见卓识，把军队屯垦看作是建设边疆，减轻各族人民负担，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西北边疆的战略措施。

投入大生产运动的 15 万官兵，沿天山南北两大盆地边缘进驻万古荒原，在“三到头”路到头、水到头、人烟到头的荒漠中，开荒造田，修渠引水，穴居避寒，囫囵吞麦，苦水为饮，盐水为菜，绳作纤，人拉犁。三五九旅的老兵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南泥湾精神光荣传统，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不是军队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没有人能在那种严酷环境下生存下去，更不要说开荒种地养活自己了。

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起义后任第二十二兵团司令的陶峙岳回忆录写道：

军垦部队到达各垦区后，遇到的困难是说不完的。垦区都是万古荒原，人烟极少，首先遇到的困难是食宿问题。既无民房，又缺帐篷，但有芦苇遍野。战士们乃砍伐芦苇，搭盖棚子，或挖地窝子，以芦苇覆盖，这样聊以藏身。但芦苇棚子并不足以避风雨，下雨时，棚里也下雨，雨停了，棚里还要继续下一阵。下雪时，晚上睡觉，早晨起来被子上也被一层雪盖着。吃的问题，不要说菜，就是麦子也没地方磨，只好将麦粒煮一煮充饥。《陶峙岳自述》144 页

1950 年，驻疆部队开荒 96 万亩，播种 83 万亩，收获粮食 3290 万公斤，油料 186 万公斤，瓜菜 2254 万公斤，牲畜 18 万头。粮食足够全军自给 7 个月，油料蔬菜基本自给。三年苦战，创造了人间奇迹。1952 年，播种 162 万亩，粮油蔬菜，全部自给。马拉犁，拖拉机代替了人拉犁，新营房代替了地窝子。是年 5 月，奇台、吐鲁番发生粮荒，奸商囤积居奇，人心惶惶。部队立即投放粮食，平抑物价，稳定市场。1954 年由二十二兵团、第二军、第六军和民族军大部投入生产的部队，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时有军垦农场 34 个，其中机械化农场 9 个。

在大生产运动中，王震高度重视创办工业。解放初的新疆无一枚机制钉，无一尺机织布，无一寸火车铁路。新中国成立之初，财政极其困难。创办工业，经费何来？驻疆部队把国家支付的军费作为建设资金，广大指战员把自己的津贴费投入合作社，并节约菜金、粮食和衣帽鞋袜甚至衬衣领子和口袋都节省了，累计每人每年节约 90 元，投入工业建设。开荒战士天热了，没发单军衣，就把棉花掏出来，当单衣穿。裤子磨破了，把裤腿剪掉当短裤穿着干活。再苦再累，有拓荒者的地方就有那首歌《戈壁滩上盖花园》。1951 年先后开工的工业项目：六道湾露天煤矿、乌拉泊水电站、新疆水泥厂、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汽车修理厂、新疆机器厂、八一面粉厂、木工厂等。1953 年，这批工厂连同 600 辆汽车和驾驶员，无偿交给地方政府，新疆的现代工业和交通业由此发轫。

毛主席在 1952 年 4 月 6 日给西藏部队的指示中，高度评价“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经站稳脚，取得了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

第四，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即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等组织形式，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一句影响广泛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也多次提出向苏联学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体现了走苏联国营农场的道路的建国战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也有偶然因素，这一点很少有学者论及。

首先是王震为书记的中共新疆分局对“东突”分裂思想高度警惕，并在少数民族上层中对其

**进行严肃批评。**2003年国务院《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中指出：1944年，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一部分的“三区革命”，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苏联乌兹别克人）窃取了“三区革命”初期的领导权，在伊宁成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任主席。1946年6月，“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撤销了艾力汗·吐烈的职务，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接受了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的提议，组成联合政府，分裂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1949年12月20日，三区革命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三区革命的领袖人物成为新疆的高层领导。但是，“东突”分裂思想并未消失。

在1950年国庆一周年，中央领导为新疆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有人公然举杯“为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干杯”；有人借新中国成立之初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提出像苏联那样成立“加盟共和国”，实质是分裂祖国的“东突”。

在三区革命的亲历者格尔夏（蒙古族）的回忆录《历史的回声》中：

1951年2月，有人在伊犁秘密召开了“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讨论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具体内容是：一、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面加上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国徽；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千山万水解放新疆很辛苦，应该回关内休息，新疆的治安由民族军负责；四、在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下面设一个维吾尔斯坦共和国观察员等。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关系到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又涉及新疆党内军内上层。

1951年4月，中共新疆分局在西大楼召开分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分局领导和各部门、各地区党政主要领导，参加过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干部，赛福鼎·艾则孜、赛都拉·赛甫拉也夫、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库夫、列斯肯（俄罗斯族）、艾尼瓦尔·贾库林、艾尼瓦尔·汗巴巴、曹达诺夫·扎衣尔、库尔班·马木托夫、阿布里米提·哈吉也夫等等。会议由新疆分局第二书记徐立清主持。会议开始即宣布：主要讨论批判最近在伊犁开的“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提出的关于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民族观的原则，进行深入地讨论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格尔夏立即意识到会议内容的重要性，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王震：

接着分局第一书记王震同志讲话，开始比较平和地说：“苏联的少数民族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各有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苏联的联邦制建立在二十世纪几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政策。所以，你们提出什么共和国问题，实际上是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极端错误行为。”说到这里，王震同志很气愤的站起来，走到北边坐着的民族同志面前，我们都跟着站了起来。王震同志又注意到旁边站的列斯肯（民族军军长、俄罗斯族），非常气愤地指着他说：“你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长，参加五十人座谈会，是叛国行为，要杀头！”我听了感到很紧张，没敢给列斯肯翻译“杀头”这个词，可是旁边站的伊敏诺夫用俄语给他翻译了“杀头”的话，把列斯肯吓得快晕倒过去，旁边的人连忙扶他出会场。

这次会上有一次批判维吾尔斯坦共和国问题时，王震同志插话中指着我们戴的民族军勋章和军衔说：“你们勋章上的标帜五星半月牙，为什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俘虏的联合国部队里的土耳其军队标帜一样？”我第一次听说我们戴的勋章军衔和土耳其的一样，回家就把它取掉了，以后也没有见到有人再佩戴过。

王震在这个关系祖国统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召开中共新疆分局扩大会议克服了错误思想的干扰，统一了思想认识，为减租反霸，土改建政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格尔夏的评价：

批判“五十人座谈会”对当时新疆的形势，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王震同志讲话对维护祖国统一，开展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是经历过长期的激烈的复杂曲折的战争历程，保持着强烈的战争思

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样，新中国的政权必须要有强大的军队来保卫。面临新疆当时的复杂局面尤其是上层的分裂思想，没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无法承担保卫边疆的任务，也无法对分裂主义形成威慑的，是“压不住阵（老革命的话）”的。

**第二，第二十二兵团领导陶峙岳、赵锡光的意见对“生产建设兵团”保留军队体制起了重要作用。**1953年5月，驻疆部队完成整编任务，所属部队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国防部队为一个二级军区，二个三级军区，十个军分区，一个国防师和四个独立骑兵团等。第二十二兵团保留暂时保留国防部队序列，管理所属生产部队。生产部队为十个农业师，二个建工师及运输团等，计15万人。据兵团老领导回忆，1954年在讨论成立“生产建设兵团”，撤销第二十二兵团时，有一种意见是“生产建设兵团”直接脱离部队序列，交新疆地方政府管辖，走苏联国营农场道路。陶峙岳等提出，1949年和平起义时，共产党的起义政策是“既往不咎，待遇不变，量才录用，留去自由”，如果撤销二十二兵团直接转业交给地方，起义官兵担心“军队待遇变成老百姓”，容易思想波动。因此，1954年7月15日，新疆军区党委会在给西北局，中央军委，新疆分局的请示中提出：

（一）生产部队领导机构名称，我们认为以生产建设兵团较为适宜。因为一方面仍用原二十二兵团的番号来领导全疆包括二，五，六军的生产部队是不相宜的，取消二十二兵团番号如不以“生产建设兵团”的番号取代之，则可能引起起义干部，特别是高级起义干部的思绪波动；另一方面，二，五，六军所编的生产部队，不愿意一下子脱离军队性质的番号，甚至因采用名称不适当，也可能引起部队的思绪波动。根据当前思绪情况，采用完全脱离军事性质的名称尚需一个过渡时期，则较为妥当。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二十二兵团的番号可以撤销。

8月6日，总参谋部复电：关于二十二兵团部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后改用“生产建设兵团”的名称问题，如你们已征得陶峙岳、赵锡光等同意时，即可按照改变之。

上述事实证明：一是当时确有意见让生产部队完全脱离军队序列。这是1975年兵团被撤销的历史根源之一。二是起义将领的意见和进疆部队领导的提议被采纳，生产部队保留了军队性质，最终决定了兵团的本质属性“武装的生产部队”（见《十二条》）。这是1981年底中央决定恢复兵团的历史根源之一。三是没有提出“屯垦戍边”历史使命。这个使命是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后强调提出的。

## 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的原因及教训

1954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六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和民族军，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4月，中央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主要理由，决定撤销兵团。1981年底，中央又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被撤销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文革”的干扰破坏，这是毫无疑义的。对全国全党来讲，“文革”的巨大破坏作用是全局性的又是较长时期的。这是事物的普遍性，而我们应注重事物的特殊性。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区别不在于其普遍性，而在于其特殊性。兵团被撤销的原因错综复杂。从国际大环境来分析，兵团成立时新疆周边的外部环境很好，中苏关系处于最良好时期，新中国实行“一边倒”国策，新疆被称为“大后方”。而兵团被撤销时，新疆周边国际关系恶化，苏方陈兵数十万并多次发出战争威胁。一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武装的生产部队，成立于和平时期，撤销于危难时期，这很不符合新中国领导人一贯坚持的寓兵于农，居安思危的战略思维。显然，兵团被撤销的主要原因须从内部来分析。本人认为主要原因：

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导致对“屯垦戍边”战略的否定，必然导致对兵团事业的全盘否定。

极左思潮诬蔑兵团的 17 年（1949 至 1966 年）历史是“黑线专政”“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严重丑化了兵团事业，全盘否定了兵团历史。而且坚持这种极其错误观念的人，正是当时兵团的主要领导人。正如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共历史导致苏共解体，这种来自当时兵团领导高层的“自我否定”，必然导致兵团被撤销的严重后果。

**1、阶级斗争的观念必然导致对屯垦戍边的全盘否定，客观形成否定兵团的思想理论基础。**屯垦戍边始于西汉，兴于唐代，延续至清朝形成较大规模。这是我国古代安邦定国的一项国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政治智慧。其核心作用是保卫边疆、巩固边防，其历史作用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简言之，我们不能说西汉的屯垦戍边是维护汉朝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唐朝的屯垦戍边是维护唐朝地主阶级的利益。不论任何朝代，面临异族入侵，保卫国土就是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对屯垦戍边也进行所谓“阶级分析”，把屯垦戍边划入“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否定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造成极大理论混乱和思想混乱，以致实际上否定了承担屯垦戍边这一战略任务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颠倒黑白，诬蔑兵团是“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全盘否定了兵团的“十七年”，客观形成了兵团被撤销的现实依据。**1949 年 12 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随后开展了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1950 年 1 月，第二、六军派出 1070 名各级干部和 600 多名参军知识青年到起义部队工作。通过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巨大成功。在部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起义部队焕发出很大积极性。今天，兵团发展较快的石河子、奎屯垦区，就是以起义官兵为主体的第二十二兵团开发的。这是我党成功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历史丰碑。

从我党我军的历史来看，从南昌起义到红军、八路军时期，我党成功地团结、改造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阀甚至土匪的部队。解放战争中，更有团、师、军成建制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投奔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起义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从“文革”在全国造成的混乱来看，尽管“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大帽子满天飞，但还没有一个“造反派”、一种“造反思潮”敢于全盘否定我党对某一支起义部队的改造。但是，这种极具危险的、错误的思潮在新疆、在兵团发生了，而且发生在当时兵团的领导层。

1964 年丁盛调兵团任副司令员，不久，裴周玉调兵团任第三政委。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对兵团在“社教”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不加分析，片面地夸大渲染，断言兵团 17 年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黑线专政”“全面贯彻了修正主义路线”“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把兵团贯彻执行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成功地团结改造了 7 万多国民党官兵开发建设新疆，说成是“国共合作”，诬蔑为“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兵团发展史》第 280 页）。于是，1966 年“文革”一开始，兵团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对“17 年历史”的评价上，并自下而上分成两大派。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下，兵团 17 年屯垦戍边的历史功绩被全盘否定，长期主持兵团党委工作的张仲瀚被错误打倒，丁、裴掌握了兵团的“文革”领导权。

**对一个人的否定导致对一段历史的否定，进而导致对兵团这一执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特殊组织的全盘否定。这是历史的一大悲剧。**这场悲剧的“胜利者”绝没有想到：一个“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的兵团能存在下去吗？诬蔑历史的人必然被历史否定。

**二、“文革”中兵团不但内部武斗，打响全国武斗第一枪，而且长期介入地方武斗，歪曲执行中央关于兵团“文革”的“十二条”，严重违反“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中央领导不能不考虑这支武装的生产部队在混乱复杂社会环境中所起的作用。**



**1、打响全国武斗第一枪，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丁盛担任兵团“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文革”初期，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并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注意政策。毛泽东还多次与“造反派”谈话，纠正群众运动的错误倾向。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全国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中。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夺权”高潮，丁盛支持的一派夺了兵团机关各部门的权。26日，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出动值班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造成震惊全国的死27人、伤78人的“石河子一二六事件”。丁、裴向中央文革写报告，诬告被镇压的群众夺枪而发生流血事件。6月，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发电报说：“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瀚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兵团发展史》第282页）这显然是栽赃陷害。

**2、毛泽东亲自批准对兵团实行“军事管制”，中央为此发布“十二条”。兵团成为“文革”中第一个实行“军管”的单位。但在当时“军事管制”被歪曲执行，造成恶劣后果。**“全国武斗第一枪”引起毛泽东、党中央高度重视。尽管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革”，造成全国极大的持久的混乱。但是有一条底线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文革”初期，毛泽东批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严肃处理，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关、戚煽动反党乱军。毛泽东十分清楚兵团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也十分清楚兵团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确保兵团的“枪杆子”不再出问题，1967年2月17日，也就是“石河子一二六”事件后的20天，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二条”）。核心内容是：兵团在新疆军区领导下，实行军事管制，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除文教、卫生、科研部门外，其他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贯穿“十二条”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无论“文革”局面多么混乱，“枪杆子”不能乱，党指挥枪不能有丝毫动摇。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但是，“十二条”在兵团被严重歪曲了。丁盛等人利用“十二条”里的某些条文，断章取义，对各级持不同观点的领导、群众，实行军事管制。兵团临时文革小组利用“军管”把武装部门凌驾于党委之上，甚至规定“没有武装干部参加的师党委，一切决议无效”。1967年7月，在兵团召开的武装会议上，交流“以枪管党”的经验“十六条”。主要是：武装部门可以命令师党委重新分工；武装部门有权清洗或提升干部；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由武装部门内查外调，有多少揪多少，不受限制（《兵团发展史》第284页）。对中央“十二条”的歪曲执行，不仅给兵团内部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在外部造成兵团介入地方武斗的严重后果。

**3、介入地方武斗，造成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加剧了新疆“文革”的混乱，严重损害了建国以来兵团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良好形象。**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全国武斗骤然升级。丁盛等人立即召开会议，介入地方派性斗争，积极策划武斗。兵团的工厂停产，赶制武器，值班连队和民兵直接参加武斗。据不完全统计，1967至1968年，兵团武斗死亡300余人。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周恩来总理严厉批评兵团介入地方武斗。中共中央采取“掺砂子”方法，于1967年7月调曾如清、孔瑞林、杜海林、朱铁谷参加兵团党委的领导班子。新领导经过深入调查，对丁盛等人的做法提出批评。意见分歧尖锐，双方均向中央发电报。1968年4月11日和5月4日，中央文革成员先后接见兵团领导。江青、吴法宪、邱会作再次支持丁盛。此后，兵团武斗自上而下愈演愈烈。

兵团介入地方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后至“文革”前的17年，减租反霸、土改建政、剿匪平叛、开展大生产运动，节衣缩食，创办现代工业。兵团成

立后挺进荒原，守卫边疆，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拥护。而“文革”开始，先是全盘否定兵团“十七年”，接着介入地方派性斗争，大搞武斗，严重损害了兵团“十七年”的崇高形象。丁、裴等领导自我否定，自毁长城，亲者痛，仇者快。第二、“文革”十年，“十二条”是毛泽东、党中央针对兵团制定的惟一的指导性文件。核心是党指挥枪。希望兵团的“枪杆子”能稳定新疆的混乱局面。而丁、裴等兵团领导严重违反党指挥枪的原则，加剧了新疆的混乱局面。尤为耐人深思的是，兵团参加地方武斗的队伍冠以“第四野战军”名称。解放战争中“四野”司令员为林彪，而兵团“四野”介入武斗最烈时，正是林彪炙手可热，被确立为接班人之时。第三、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时隐时现，时缓时急，从未停止。兵团的存在是分裂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加之地方民族主义长期存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互相交织，社情复杂。“文革”中兵团介入地方武斗，严重损害了兵团与各族人民的关系，无异于授分裂势力以柄。“文革”中“东突”分裂组织就曾借“群众组织”之名，冲击兵团农场，妄图抢夺武器。

**三、“文革”十年，兵团经济面临崩溃，一手向国家要钱，一手向国家要粮，成为国家沉重包袱。**

兵团成立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生产条件很差。经过兵团领导的努力工作和广大军垦战士的艰苦奋斗，“文革”之前，兵团经济形势很好。1966年盈利1.13亿元，1974年亏损1.96亿元。人口增加77万人，粮食总产由7.2亿公斤下降为5.25亿公斤。1967至1974年，国家补贴款达5.86亿元，是全国农垦的亏损大户，而且连年吃返销粮。与此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是：被极左思潮全盘否定的兵团“十七年”，粮食自给有余，财务已有盈利，工农商副、教科文卫，欣欣向荣，全面发展。

1975年3月，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关于改变兵团体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请示报告》。报告陈述撤销兵团的理由是：“兵团问题很多，主要是领导上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政策不落实，领导班子，特别是党委常委内部不团结，经营方向有问题，没有认真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生产上不去，粮食不能自给，亏损越来越多等等。”并说“存在这些问题，同兵团的体制问题有很大关系。”这显然不合逻辑，“领导上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怎么是“体制问题”呢？而且经济临近崩溃，也不一定完全是“体制问题”，因为兵团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不是曾创造出屯垦戍边事业的辉煌吗？

197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1975）11号文件批转了上述报告。兵团被撤销。自治区成立农垦总局，接管兵团。

### 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的原因

首先，撤销兵团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其一、新疆周边形势严峻，而边防力量大为削弱。兵团一直是新疆国防的后备力量，而且兵团58个边境农场驻守着2000多公里边境线。当时中苏两国边界尚未划定。撤销兵团使国防后备力量大大削弱。1979年2月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新疆边境地区军事形势紧张严峻，战争威胁严重。新疆边境地区出现农垦职工干部群众内迁，人心惶惶。其间新疆周边形势更加严峻，苏联入侵阿富汗，直接威胁我国西部边境安全。其二、兵团农场人心涣散，人心思迁。屯垦戍边神圣使命的感召力凝聚力大大削弱。五六十年代的城市支边青年、复员军人等“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三、农垦经济大滑坡。1974至1977年财务亏损甚至超过“文革”后期。1978年后，农垦经济步履艰难，亏损严重。那种认为撤销兵团就能把经济搞上去的想法，被历史证明是错误和浅薄的。其四、维护新疆大局稳定的力量严重削弱，“三股势力”乘机抬头，破坏国家统一、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性闹事接连发生。1981年之内，喀什地区就发生了“叶城1·14”事件；伽师“5·27反革命武装抢枪事件”；喀什“10·30严重打砸抢骚乱事件”等。全疆不稳定苗头增多。

其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寓兵于农”“屯垦戍边，劳武结合”等战略思维深深影响着治国战略。以王震为代表的熟悉新疆复杂历史和现实的党内高层起了决定性作用。“文革”结束后，王震将军站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高度，积极主张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1年2月，王震在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大会上讲：“解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完全错误的”。6月30日，王震上书邓小平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议。第二天即7月1日，邓小平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做一系统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8月，邓小平亲临新疆视察，表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很有必要”（《兵团发展史》第352页）。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这是党中央总结新疆历史、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

**第三，从1949年底到1966年“文革”之前，17年中新疆兵团对新疆乃至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兵团得以恢复的历史基础。**

### **一、建设奇迹：兵团创造了一系列“第一”。**

**第一批现代化军垦农场：**1950年，驻疆部队开荒96万亩，播种83万亩，收获粮食3290万公斤，油料186万公斤，瓜菜2254万公斤，牲畜18万头。粮食足够全军自给7个月，油料蔬菜基本自给。1952年，播种162万亩，粮油蔬菜，全部自给。马拉犁，拖拉机代替了人拉犁，土块盖的新营房逐渐代替了地窝子。1953年，兵团已经建成机械化农场34个，其中机械化农场9个，推动了新疆的社会发展。

**第一批现代工业：**1951年先后开工的工业项目：六道湾露天煤矿、乌拉泊水电站、新疆水泥厂、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汽车修理厂、新疆机器厂、八一面粉厂、木工厂、肠衣厂，毛巾厂，水磨沟发电厂，肥皂厂等。1953年，这批工厂连同600辆汽车和驾驶员，无偿交给自治区地方政府，新疆的现代工业和交通业由此发轫。

1954年兵团成立后，围绕农业和职工生活开办粮油加工、轧花厂等，随着事业发展，开始大办轻工业即酿酒、纺织、制糖、农机修理、毛纺等。兵团的轻工业不但为新疆各族人民提供了生活用品，而且积累了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1966年，兵团工业企业达297个，工业总产值6.12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62.7%，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9.1%，重工业占30.9%，利润达8359万元。工业产品主要有钢铁、煤炭、水泥、化肥、棉布、毛布、机制糖、皮鞋、酒、卷烟等，有力支援了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极大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

**第一批现代建筑业：**1950年10月，为尽快发展新疆的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造福各族人民，新疆军区成立工程处，各师也成立了工程部队。1951年开工的所有工厂由工程部队建设，还建成了一系列民用建筑，新疆医学院，八一农学院，天山大厦，独山子油矿等。建筑部队转战天山南北，发展壮大，到1953年，已有1个建工师和4个独立团，共3.8万余人，形成一支从勘测设计，建筑施工到建材生产的综合建筑队伍，承担了新疆大部分厂房，水电，交通等重要工程项目，为新疆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1954年完成工作量达6154.26万元，是增长幅度最快的行业，也是各族人民最为称赞的行业。1966年，兵团有工一师，工二师，工三师和各师的工程大队，人员11.6万余人。这支队伍专业精，守纪律，机械化程度高，继承发扬了解放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完成了自治区多项急、难、险、重的建筑工程。

**第一个遍及全疆的现代商业网络：**解放前的新疆商业还停留在驼马运货，坐地行商，以物易物的落后阶段。解放军进疆后，现代商业开始发展。兵团逐步建成了现代化的商业体系，从城市到边远垦区，拓荒者走到那里商店就跟到那里。兵团的商业网点遍布天山南北各个垦区。商业职工们积极组织货源，沟通产供销渠道，为垦区职工和各族人民提供了价廉物美的生活必需品，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1966年，兵团有商业网点1836个，营业额达4.38亿元，连续4年盈利累

计 5653 万元，平均年利润 1400 万元。

**第一批现代水利工程：**新疆是灌溉农业，雪山是天然水库。水利是新疆农业的命脉。屯垦之要，首在水利。1954 年，兵团首先开发乌鲁木齐河与玛纳斯河流域。接着开发塔里木河流域。逐步形成了沙井子，塔里木，小海子，奎屯，玛纳斯，伊犁河，塔城，博乐，哈密，和田等 31 个大中型灌区。1966 年，兵团在天山南北环绕塔里木、准噶尔两大盆地，修筑大中型引水渠 146 条，年引水量达 56 亿立方米。建成水库 37 座，总库容 14.9 亿立方米。灌溉渠道 4 万多公里，耕地面积 1213 万亩。

**第一座现代农业大学：**1952 年，进疆部队创办八一农学院，1957 年移交给自治区。1959 年，兵团创办石河子农学院，1960 年，兵团成立塔里木农垦大学。天山南北，两所大学，为兵团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农业科技人才。同年，石河子卫生学校改为兵团医学专科学校，后改为石河子医学院。1966 年，三所大学在校生达 1725 人，教师 450 人。

**第一批大面积的人造绿洲：**1954 年兵团成立时耕地面积 115.95 万亩，1966 年迅速扩大为 1212.9 万亩。每年的开荒造田面积近百万亩。农业随之快速发展。围绕建设大面积高产稳产田的奋斗目标，推广平地，治碱，排灌配套，草田轮作，改建条田，营造防护林带和培植林区，建立机械化农场，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1966 年粮食单产 138 公斤，总产 7.2 亿公斤。棉花面积 64 万亩，单产 39 公斤，总产 2494.48 万公斤。甜菜，油料也获得丰收。同时，兵团建成机械化连队 500 多个，机械化农场 49 个。全兵团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全国农垦领先。

## **二、中央战略：全国支边、兵团发展**

1956 年，来自中原河南的支边青年 45436 人，奔赴新疆兵团。这是兵团成立后第一次接受来自内地的大规模支边青年。1957 年，河南又从商丘等 8 个地区动员 4 万青壮年支援边疆。1958 年，河南再次动员 2 万多支边青年进疆到兵团乌苏垦区开荒。河南支边青年来自农村，年轻力壮，吃苦耐劳，勤俭朴素，成为兵团五十年代大开发的生力军。

1956 年，兵团通过劳动部招收四川，广东，江苏等省招收 4894 名财会卫生等专业人员。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在“二五”计划期间动员江苏、湖北、湖南、安徽 4 省百万青年支援边疆建设。至 1961 年，共有江苏、湖北、安徽支边青年 30.2462 万人，奔赴新疆兵团。

国家大力支持兵团屯垦戍边伟大事业，每年有计划地将部分大中专学生分配到新疆。1959 年至 1974 年，兵团安排了大中专毕业生 1.2878 万人。

1959 至 1961 年的国家困难时期，兵团接受了自动支边人员 21 万人。

1963 年至 1966 年，国家动员了京、津、浙、沪等 12 万支边青年进疆，其中有 9.7 万上海支边青年，成为兵团朝气蓬勃的建设力量。这是自西汉以来，西域两千多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支边壮举。地处阿克苏的农一师的前身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一部，有 45402 名上海支边青年来到农一师。同时，还有南京军区，武汉军区等 8 万复员军人来到兵团，成为加强边疆战备的重要力量。对新疆兵团的发展壮大、社会全面进步产生了深远的持久的影响。

1963 年至“文革”之前，中央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寓兵于农，备战备荒，以兵团为“龙头”带动西部的发展。新疆兵团在河西走廊组建农十一师，在宁夏组建农十二师，在青海组建农十三师，在陕西组建农十四师和黄河中下游水土保持兵团，在西藏波密组建一个机械化农场。“文革”之前兵团的屯垦戍边事业达到了巅峰。

“文革”之前，兵团承担了国家赋予的援外任务。先后援建了越南；非洲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家现代化农场项目；援建了中巴公路。

## **三、六十多年的“兵团制造”：国土和民族团结。**

在今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之时，回顾新疆兵团 60 年发展史，“兵团制造”是国土和民族团结。

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兵团奉命组建边疆农场。同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兵团承担了战备运输任务，并有一个汽车连参战，受到中央军委嘉奖。随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9年3月爆发珍宝岛之战，苏方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新疆边境面临严重战争威胁。中苏边境绝大多数地段未划定边界，苏方擅自划定所闻“争议区”。兵团人为保卫国土“只争不议，寸土必争”，付出了重大牺牲。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哈、中乌、中塔等国与我国相继划定了边界。

兵团人守卫国土，同时改造了国土，把沙漠变成了绿洲。兵团的垦区呈“一线两圈”：即沿两千多公里边境线建设了58个边境农场；环绕天山南北两大沙漠建设了一百多个现代化农场。建设了石河子、五家渠、阿拉尔、图木舒克等新兴城市，创造了适合人类居住的新的生态环境。

增强和巩固新疆各民族的团结是兵团的历史贡献。

1955年即兵团成立第二年，兵团党委做出《关于援助新疆地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定》，要求每个师重点帮助5-7个合作社，技术、管理、思想等，全面包干。1957年又在《关于支援农业社争取1957年农业大丰收》的指示中，明确强调加大推广先进农业科技的力度，以先进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从1955年到1957年三年中，一个增强民族团结、帮助地方发展的热潮，在天山南北兴起。兵团共抽调1200名政治、技术干部，对25个县、403个农业社进行帮助指导。培训植棉、灌溉、农机、植保、财会等技术人才3800多人。兵团帮扶的农业社粮棉产量提高30%至60%，有的甚至成倍增长。1956年兵团帮扶的137个农业社就有122个被地方政府评为模范社。1958年，兵团帮助农业社培训技术人员达4647人，支援劳力65万工日，代耕土地21万亩，免费为各族社员治病6.9万人次。当时出现一个引人注目新现象：离兵团近的合作社产量高，有病能及时送兵团医院治疗，文化教育发展快；离得远的就产量低，看病难，发展慢。各族人民亲近兵团，支持兵团，兵地关系水乳交融，亲如一家。1960年3月，农七师三管处300多名职工到托里山中伐木，归途中突遭特大暴风雪，被困山中，饥寒交迫，生命危急。托里县副县长率各族社员携带爬犁拉着粮食，冒风雪，爬大坂，苦战四五天，终于救出了300多名兵团职工。

1959年，兵团党委总结部队进疆10年，兵团与地方政府、与各族人民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经验，颁发《关于拥政爱民为各族人民大办实事纲要二十条》，使增强民族团结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1961年，兵团又决定在兵、师两级政治部成立群工科，民族团结工作成为各级政工部门重要职责。

1963年11月，自治区党委提出“兵团方向，公社特点，长远规划，逐步实现。建设像兵团农场一样的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的五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好建设”在天山南北轰轰烈烈展开，激发了各族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从自治区领导到各地、州、县的领导，纷纷率团到兵团参观学习。有的少数民族老百姓骑着毛驴来参观垦区。兵团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造福各族人民的宗旨，是看得见，摸得着，活生生的现实，给各族人民以极大鼓舞。

兵团党委决定从1964年始，每年拿出自筹资金800万元，帮助地方“五好建设”。到1966年三年中，兵团帮助58个县的部分人民公社规划土地、进行“五好建设”。共投资2393.95万元，完成99个项目，勘测土地852万亩，规划设计924万亩，建设条田174.5万亩，修筑水泥卵石渠道91公里，修建水利设施2066座、民房26340平方米。兵团派出驻社干部752人，帮地方培训技术人员2097名，接待参观学习1.48万人次。

今天，遍布天山南北的小康农村新气象，就是当年“五好”新农村建设栽下的幸福树结出的硕果累累。

如果没有兵团“屯垦戍边”伟大的历史贡献，没有十七年的历史辉煌，被撤销后再恢复是不大可能的。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兵团建立、撤销、恢复的历史教训主要是：

一、兵团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牢记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坚

决克服左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影响。国务院《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历朝历代都把屯垦戍边作为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国策。中央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屯垦戍边始于西汉，以后历代相袭。这对统一国家、巩固边防，促进新疆社会 and 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新疆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是这一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战略利益的，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必须站在这个历史高度看兵团。

**二、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复杂的条件下，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兵团的“枪杆子”必须让党绝对放心，让新疆各族人民绝对放心。**因为兵团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不是一般的纯经济组织。兵团的“枪杆子”作用是维护国家统一，抵御侵略、反对“三股势力”，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长治久安。

**三、兵团的经济必须不断发展，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兵团体制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挑战应对不好，经济搞不上去，任何“特殊性”理由都站不住脚。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搞上去了，是兵团存在的硬道理。“奋起二次创业，再造兵团辉煌”是兵团事业的强大动力。如果老是纠缠于“体制问题”，而忘了“文革”撤销兵团就是“体制问题”，又会犯自我否定的历史错误。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是屯垦戍边使命的有效载体，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需要多长时间，兵团的特殊体制就将存在多长时间。

**四、兵团必须积极实践自治区党委提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推进新疆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并作出表率。**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方向，以爱国主义和时代精神为特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传承和提升区域特色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适应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文化。现代文化的内涵主要是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等。现代文化的核心就是引领人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兵团的特殊体制应当而且可以发挥现代文化“排头兵”的作用。

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型的；新一轮旋转仿佛回到原点，其实比原点更高更先进。总结兵团建立、发展、撤销、恢复、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使我们能够更清醒更成熟地把新中国的屯垦戍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为实现党的十八大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 【论 文】

### 《中华民族大团结》教材出版的前前后后<sup>1</sup>

杜雪巍、曹志恒<sup>2</sup>

#### 部颁教材的偏差与风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法律法规对在我国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2009年，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民委联合发布《关于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全国大中小学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并纳入课程和考试评价。由此，教育部、国家民委组织编写并向全国中小学发行了民族团结

<sup>1</sup> 本文刊载在《新疆文史》2014年第1期。

<sup>2</sup> 杜雪巍：《新疆文史》执行副主编，执行总编辑；曹志恒：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

教育四本系列教材：即《中华大家庭》(用于小学三、四年级，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民族常识》(用于小学五、六年级，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民族政策常识》(用于七、八年级，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民族理论常识》(用于高中一、二年级，红旗出版社 2009 年版)。

新疆中小学当年采用了这本教材，因少数民族学生的需要，新疆的教材必须翻译成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柯尔克孜语。由于翻译者把握不准，于是向自治区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马品彦（新疆社科院中亚所研究员）、戢广南（新疆社科联研究员）请教。马品彦、戢广南初步看到该教材，感到该教材存在一些不适合新疆的一些内容，当即向新疆教育厅做了反映。

自治区教育厅领导对两位专家的意见十分重视，厅党组书记赵德忠立即安排相关处室人员到北京，向国家教育部主管此事的民族教育司反映。民族教育司的领导叫来该套教材的主要编写人员金炳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等进行沟通，原编者听不进新疆同志的意见。在当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的大背景下，民族教育司的领导相当重视新疆方面的意见，破例在原教材未做调整的情况下，允许新疆方面根据新疆实际对该教材略作修改。故而新疆在印刷该教材时，删减了个别词句和图片。当年该教材在全疆中小学使用了。

第二年 6 月，该教材由原来试用本成为正式教材。看到该教材继续在新疆使用、全国大面积发行，在教育厅基教处组织的教材工作座谈会上，新疆学者马品彦、戢广南、潘志平（新疆社科院中亚所所长、研究员）、孟楠（《新疆大学学报》主编、教授）都对该教材提出了不少意见。会后，由戢广南梳理并撰写了简要报告，报送自治区教育厅。

之后，戢广南基于多年研究，深感该教材一些偏差反映了多年来我国民族团结教育存在的重大问题，对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不利。为了能够充分说明问题，戢广南执笔撰写、四位专家共同署名上报了《教育部民族团结教育教材倾向性问题和不妥之处应予纠正》一文，约 5000 多字。该文有理有据地列举事实，揭示出该教材 2009 年教育部版中小学四本教材过多地提示和强调了各个民族的分界差异、所属不同，主导倾向是强化各民族的“分”而不是“合”，容易导致民族分界意识的增强，不利于中华民族认同和边疆长治久安。

在《教育部民族团结教育教材倾向性问题和不妥之处应予纠正》的建议文中，作者指出了该教材的诸多不妥之处，比如：教材处处提问“你属于哪个民族？你知道哪些本民族的人大代表？”“你了解自己所属的民族吗？”“你们班有少数民族学生吗？他们是哪个民族的？”“你的民族语言是什么？”“你的民族主要信仰的宗教是什么？”——这样在本来是平等友爱、几乎没有什么民族界限的中小学生刻意区分出不同民族，强调彼此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权利不同，要着意分清“你是你，我是我”，容易在学生心目中悄然形成“我们不是一家人”的意识。

作者指出教材内容实际上是严格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开，主要讲的是各民族的区别区分，说差异，强调不同民族传统，过多地提示和强调各个民族的分别分界，所属不同。讲了 55 个民族知识，说到少数民族地区，都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美丽富饶，却几乎不讲汉族知识，容易把少数民族与汉族区分割裂开来，这并不完全实事求是，还客观上增加民族分界意识、权属意识，实际效果并不好，不利于国家资源开发和各民族共有共享国家资源。该教材几乎不讲中华大家庭各民族的血肉联系，融合共通，不讲清楚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而对中国民族状况，“多元”讲的很多，“一体性”几乎不讲。书名叫《中华大家庭》，读后让人感觉到却是只见 55 个民族“小家”，很难看到“中华大家庭”。这种片面的倾向，不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偏离了真正的民族团结思想和“三个离不开”的原则。

建议文还进一步指出了该教材对宗教方面的阐述把握不准、表述不恰当，文字表述不严谨、出现多处（至少 18 处）表述错误等问题。比如教材中有这样一段话“桂林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这里生活着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他们共同建设着这座著名的风景城市。”——如此看来桂林与汉族毫无关系。读了这些，学生是很容易得出广西桂林不是汉族的、现在人口居多数的汉族桂林人是移民、是外来客居者、汉族是少数民族资源的侵占者这样的错误结论。

《民族常识》第 68 页：“我国西北的新疆一带，历史上被称作西域，居住着维吾尔、回、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少数民族，他们发明了坎儿井用来灌溉农田，在干旱的戈壁滩上开垦出一片绿洲。”——这给人的印象是历史上新疆的传统居民、新疆的开发建设没有汉族，这不是有违我们多年熟知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汉族自古以来就是长期在新疆开发和居住的民族”这样的基本历史事实吗？！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内，如果不讲共同性，而是片面强调本民族所属，强化本民族意识，强化分界意识，不利于中华认同、国家认同，不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势必淡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有害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基础，其潜在危险不容低估。

最后作者认为该教材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存在严重偏差，科学性也不足，作为教材是不适合新疆等民族地区的。因而明确建议：1、新疆停用此套教材；2、建议教育部重新审查、重新编写；3、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按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求，纠正某些偏向，正确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文章有理有据，内容充分，说理透彻。自治区教育厅据此上报教育部。同时，该文内参被刊登在新疆社科院《专报》2010 年第 8 期，上报给中宣部、中央新疆办，很快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中央领导很快作出批示，决定由中宣部、教育部重新组织审查，重新编写，并将该教材编写工作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央新疆办发函指出，中央领导同志阅后，肯定了此文观点，并指示教育部门对教材作出修改。并要求新疆方面继续关注这方面工作，中央领导指出：此文分析的很有道理。民族团结教育教材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各民族“两个共同”的指导方针。请教育部立即审读，商有关部门重新编写。

2010 年 6 月 22—24 日，中宣部、教育部在京召开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教材审议会，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批示。7 月 14 日，教育部社科司将初步修改过的教材邀请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和新疆的戡广南等专家审阅，要求提出书面意见。戡广南的书面意见认为“民族团结教育中小学教材是关系到全国上亿学生在他们的世界观形成时期如何建立“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如何处理这两者与自己所属“民族”的关系等基本的“国家观”“民族观”这样重大的问题，意义非同小可。现代世界上任何多民族国家都把“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树立和加强放在学校教育的核心地位。如果我们的教材、中小学教育处理不当，在少年、青年一代中造成“本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相互矛盾乃至对立的认识，可能给国家未来、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带来隐患。”他审阅教材后认为，初步修改后的教材在原有基础上小修小补难以解决问题，必须调整思路，做重大修改。建议应通盘考虑、重新设计编写教材。

2010 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听取专家意见，决定另起炉灶，重新编写（因国内民族理论界争论，教育部新编教材迄今未出版）。因为新疆学者的内参导致部颁教材重编，几十万教材在新疆停用，此事在教育界乃至社科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宣部、教育部的领导和国内民族理论学界给予高度评价，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大学等一些著名学者（如北京大学马戎教授、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主任马大正）认为该文揭示了多年来我国特别是边疆地区民族教育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对中小学民族团结教材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对全国民族工作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马大正说“没想到新疆学者提出了这样重大的问题，直接推动了全国民族团结教材建设，这在中国社科院也是重大成果！”

其后，《教育部民族团结教育教材走向性问题和不变之处应予纠正》一文获得教育部社科司《成果要报》2010 年度优秀咨询报告奖，评委对其资政作用和学术价值高度认可。

## 《中华民族大团结》教材的编写出版



2010年，自治区教育厅根据中央领导批示精神，着眼于新疆的复杂形势和长治久安的需要，果断暂停了该教材在新疆的使用。在等候教育部新编教材两年未发的情况下，应中小学校教学的迫切需要，自治区教育厅于2011年委托戡广南、马品彦等主持编写新疆版的民族团结教育教材。

戡广南在新疆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疆内社科研究人员、高校教师和中学教研人员开展编写工作。他们认真学习党和国家民族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十七大报告关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关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基础上，决定根据新疆实际情况，吸收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确定“中华民族大团结”主题，按照“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立场阐述民族团结的道理”这一思路编写新疆版民族团结教材。

该教材编写历时一年多，教育厅领导高度重视，相关处室具体指导，自治区社科联、社科院领导也给予了支持。书稿成文后，经过自治区社科界、教育界和宣传部的领导、专家多次审查多次修改，审查组人员达13人，基本包括了疆内这一领域的大家、名家。自治区党委常委尔肯江·吐拉洪、自治区副主席靳诺都亲自审读，提出宝贵意见。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后最终审定书稿，认为契合十八大强调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精神。2012年11月，经教育厅党组会议通过，决定出版该书作教材。

2012年12月，《中华民族大团结》正式由新疆教育出版社出版，首批8万册发到全疆，作为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地方教材，供全疆高中阶段一、二年级使用。2013年自治区教育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开设与考试评价工作的通知》（新教基办〔2013〕6号），指出“民族团结教育属于自治区重要地方课程，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教材由自治区教育厅统一安排”，要求“从2013年7月起，《中华民族大团结》将作为全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的唯一指定教材”。2014年再次印发到全疆。目前教材已在全疆高中使用2年，受到新疆各族师生的欢迎和社会的赞誉，也得到教育部的好评。

## 《中华民族大团结》教材的创新之处

《中华民族大团结》教材主编戡广南认为，学校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应当讲清楚民族团结的道理，而不是简单介绍民族知识；要改变过多强调民族“边界”意识的做法，而是基点在讲“合”。在本来就客观存在族群大差异的多民族地区，要更多地讲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注意讲共性、说融合、促统一，增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既要讲56个民族，更要讲中华民族，在尊重56个民族传统的同时，注重培育“国族”意识。要通过讲清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传播正确的民族发展理念，通过树立中华民族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他说：“民族意识”是一把双刃剑，民族团结教育要把握好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越是多民族地区越要强调一体性。建立和巩固中华民族认同，这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条件，是十八大报告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应当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目前边疆民族问题的一个症结是缺乏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教育，忽视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现行一些“民族理论”，是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定位在56个“民族”这一层面，没有突出“中华民族”这个全体中国人必须树立的核心概念，客观结果是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结果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苗族、彝族等等都是实的，谁是“中华民族”却成了虚的。

戡广南介绍，当前国内民族理论界一些人对如何认识中国的“民族”概念、在讲民族理论时是应当突出“中华民族”还是突出“56个民族”问题上存在片面观点。分析一些民族理论教材，其主导思想是把本“民族”（汉、满、蒙、回、藏等）看作是核心认同，教育学生13亿国民分属于不同的56个民族，56个“民族”各有各的身份、自治地区、政治权利和语言、宗教等文化

权利，应当以本“民族”为单元来衡量各民族是否“事实上的平等”，并把56个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如“美利坚民族”）相提并论。

他们没有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强调“多元”，不愿讲“一体”。民族理论界甚至有人明确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他们说要讲“民族”就是56个民族，“中华民族”像“阿拉伯民族”一样不是一个“民族”。有的还进而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然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实践中就应当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都有常设的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一样，设立56个民族的“民族院”，凡民族地区、民族事务都应当由“民族院”讨论决定。

以上问题是涉及我国根本的重大问题：核心是中国到底有没有、要不要建设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到底中国是“中华人民”的统一国家还是56个民族联邦？如果连中华民族都不承认，何谈“中华人民”共和国、何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还有人总是强化各民族分界意识。一些教材不讲清楚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不讲清楚千百年来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民族的发展变化规律，不讲中华大家庭各民族的血肉联系、融合共通，而主要讲各民族的区别区分，说差异，片面地强调民族特点和民族传统，民族一成不变，维护和发展民族差别，甚至想方设法人为制造、固定少数民族的“族源特征和文化遗产”；这很容易导致少数民族“趋异”心理，形成狭隘民族意识和狭隘的“领地”甚至“领土”意识，造成民族界线森严，其后果是构筑了民族壁垒，形成文化隔离。

应该看到，近年来随着国情的巨大变化，传统的民族团结教育客观效果已经十分有限。比如多年来学校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基本上是讲56个民族概况，往往从各民族的特点讲起，着重讲各民族渊源、传统，再讲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国家照顾少数民族，总是举例讲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内地支援民族地区等等。这样讲虽然也对，但是往往是民族知识讲得多，重点没有放在讲清民族团结的深刻道理。特别是一些教材在阐述中总是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开，较多地讲各民族的服装、语言、习俗、宗教等不同民族传统，过多地提示和强调各个民族的分别分界、所属不同，强调各民族差异。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多元”讲的很多，“一体”几乎不讲。这样往往客观上是在各民族中分清“你是你，我是我”，潜在地形成“我们不是一家人”的意识，容易导致青年学生们头脑中民族分界意识的增强。这样教育的结果可能造成一些人个体民族意识强，中华民族意识弱，实际上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和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稳定。

因此新编的《中华民族大团结》教材力求密切结合新疆实际，从历史与现实、哲理与法制等多角度阐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意义，旨在增强各族学生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的责任感。该书从体系结构到内容阐述都根据党和国家民族理论和政策精神，紧密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具有原创性：第一单元“中华民族篇”阐述中华民族的形成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内涵与中华民族精神；第二单元“爱国统一篇”阐述爱国主义是推动中华民族前进的精神动力、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第三单元“团结发展篇”阐述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基本保证、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第四单元“制度保障篇”阐述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政策保障和法律保障。

该教材在结构、内容等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创新：主要是在充分尊重各民族多样性的基础上，强调中华民族一体性，与十八大强调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完全契合。教材没有强调各民族“分”的差异，而是通过讲清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反映民族发展“合”的规律，阐述中华民族求大同、存小异的“团结规律”；不是片面讲传统民族理论、把民族团结教育简单搞成民族知识教育，而是通过历史、哲理、政策、法制的角度把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道理讲清楚。

《中华民族大团结》教材创新民族团结教育思路，力图讲清楚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强调中华大家庭各民族的血肉联系、融合共通，找回各族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通过树立中华民族意识，

形成各民族都是一家人的观念，从而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归属感，构建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 《中华民族大团结》教材出版后的反响

《中华民族大团结》出版发行后，各界反映很好。新疆教育界和民族理论界普遍认为，这本教材探索以中华民族认同为主线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立场阐述民族团结的道理，体现了新形势下民族团结教育的新思路，是民族团结教育的新实践，对我区民族团结教育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教育报》、《央广新闻》、新华网、天山网等疆内外媒体都做了报道。中央领导同志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该书的内参报道批示给教育部。

2013年4月24、25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民族教育司在北京召开《民族常识》教材审查会议，专门邀请了新疆专家戢广南参会。会后戢广南撰写了《关于学校民族团结教材建设的问题与思考》，由自治区专家顾问团《决策特参》（2013年第3期）上报。2013年7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做出肯定性批示，自治区党委常委尔肯江批示教育厅根据新疆实际，做好教材工作。自治区教育厅明确新疆将继续使用自编教材《中华民族大团结》。

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何星亮研究员在教育部会议上，看到新疆编的《中华民族大团结》教材后给予高度评价。会后他在给中央领导的内参《教育部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教材不宜在新疆、西藏等地发行和使用》一文中，特意推荐新疆版的民族团结教材。文中说“2013年新疆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戢广南主编的高中版民族团结教育教材《中华民族大团结》，该书的写作思路、结构和内容与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有很大的不同。全书分四篇：中华民族篇、爱国统一篇、团结发展篇和制度保障篇。该书指导思想明确，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有利于学生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淡化狭隘的民族意识，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强化‘四个认同’。各地在编写地方性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时，可以借鉴和参考。”

2013年8月9日《中国社科院研究要报》刊发该内参稿，教育部研究贯彻中央领导批示，决定再次改编教材，高中教材不在新疆使用。此时，新疆编的《中华民族大团结》更突显重要性。

从该教材编写全过程看，新疆社科工作者着眼新疆长治久安，不唯书不唯上，勇于挑战传统民族理论权威，发现长期以来民族团结教育存在的偏差：思路富有前瞻性，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对策建议被中央领导采纳，产生了重大社会效益，对全国民族团结教材编写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为学校民族团结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反映了我区社科工作者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良好学风和为国家为人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对自治区乃至国家教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社会科学巨大的咨政价值。发挥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用，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国内影响很大，得到相关部门和社科界好评。

## 【网络文章】

### 从中专到清华园，一个维吾尔族博士的成长和心语<sup>1</sup>

吐尔孙·艾拜

清华大学博士生，自治区团校干部

<sup>1</sup> 文章来源：“新疆有话”微信公众号，链接：<http://mp.weixin.qq.com/s/EEuX1NCbag27XSKxNISmyQ>

## 自治区团委驻和田县巴克墩村工作队成员

我叫吐尔孙·艾拜，最近看到很多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在网上的发声文章，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故事和看法。

我出生在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去世的时候我和弟弟还在上小学，那之后生活的重担便全落在没有工作的母亲身上。初中毕业后为了尽快工作，我考入莎车师范学校，但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希望就此落空。母亲不忍看到我的失落便把我送到县高三复习班备考大学，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为了备考，早晨天没有亮我就起床早读，晚上吃完饭就看书，有时半夜醒来发现趴在书上灯还亮着。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我参加高考被复旦大学录取，2009年考上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工作。2014年9月，我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录取，攻读博士学位，2016年，我进入新疆团校工作，2017年，根据组织的安排，我来到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

回眸走过的历程，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这是一场无数感动和感恩的旅途。作为一个从南疆走出来的博士生，一路走来要感激的人和事太多太多。我能走到现在得益于母亲的坚持和执着，得益于学校和老师的关怀，得益于亲朋好友和热心人士的无私帮助，更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以及欣欣向荣的时代背景。

**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感到幸运。**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陪母亲去买菜，她为了几毛钱在讨价还价，显得很可怜，当时我说了一句：“只是几毛钱，你给他就是了”。母亲看了我一眼，付完钱就走了，一路上一语不发，眼睛含着泪水。现在每每想起那一幕，我都为自己的无知而悔恨。在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学校的老师得知我家境困难后，主动为我联系勤工助学岗位、协调解决助学金，帮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在清华园，也有一些来自贫困国家的同学，他们得到的奖助学金用不完寄回家里，足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我想，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国家和时代，可以给我一个通过勤奋耕耘实现梦想的时代，让我有机会追逐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团结友爱的国家感到幸福。**在内地求学的十年，是充满感动和感恩的十年。学校的老师不仅授予我专业知识，更是让我懂得做人做事的准则，涵养一种家国情怀。硕士生导师郭庆光教授为我推荐实习和工作岗位，手把手的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博士生导师李彬教授如同父亲般照顾我，为我制定阅读书目名单、研究计划和博士论文提纲，使我的学业顺利又丰富。可敬可亲的史宗恺老师，始终关注我的成长，每当想起他那慈祥的面孔时，我心里无比温暖和感慨；临近毕业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是新疆培养出来的孩子，新疆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少数民族高材生，应该回去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他真诚的嘱托，让我不再犹豫，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在家乡工作的每一天，我都感觉是充实的，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更好的服务群众、锻炼成长、体现价值。

**我为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感到自豪。**2011年6月，我就读研究生期间光荣入党，至今还记得我向培养老师说的话：“我亲眼目睹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群众在党的关怀下安居乐业，融洽相处，幸福生活，我的成长也离不开党的培养和关心，我希望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回到家乡工作和驻村期间，我更坚定了这个信念。在我的老家莎车县，小时候我走过的土路、逛过的巴扎、住过的土坯房、喝的涝坝水、点过的煤油灯，现在都变了样子。我工作的巴克墩村，笔直的柏油路、漂亮的抗震安居房、甘甜的自来水、水泥防渗渠、整齐的农田，还有幼儿园小朋友最喜欢的羊肉抓饭，看到这些，想起我小时候陪母亲买菜的场景，他们是幸福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群众做这些，是光荣和自豪的。

与这些幸福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疆维吾尔族群众身上的“暴徒”标签。当看到部分维吾尔族青年同胞被“三股势力”蛊惑、欺骗，走上实施暴恐的歧途，成为“三股势力”的“炮灰”，

成为被各族人民群众愤恨唾弃的犯罪分子时，我心里无比痛苦和悲愤。作为一名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我想在这里与青年朋友们分享几句心语。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认清“三股势力”的罪恶本质和险恶用心。**2015年4月，我在共青团中央挂职时到喀什调研，一个女孩对我说：因为被“三股势力”蒙蔽，哥哥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并受到惩罚，我们非常想念他，惋惜他的愚昧无知，父母眼里从未断过泪水。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期间我也亲眼见过，那些父母、妻儿为家属的罪行撕心裂肺、痛哭流泪，他们后悔为什么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亲人。借此机会，我想和维吾尔族青年朋友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反思：我们从小听到的倡导和平、友善的伊斯兰教什么时候变成了倡导伤害无辜群众、破坏幸福家庭、将穆斯林群众推向痛苦深渊的伊斯兰教？那些打着“民族”“宗教”旗号，散布谣言和谬论、曲解历史、蛊惑人心、制造暴恐事件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自己不去所谓的“天堂”？全国同胞记忆中维吾尔族勤劳、好客印象什么时候被“暴徒”取代了？全国同胞印象中维吾尔族的热情好客什么时候被“检查身份证”“拒之门外”代替了？五一夜市、人民公园什么时候被取消和安装一道道安检门代替了？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只要我们擦亮眼睛，认清“三股势力”的罪恶本质，配合党和政府铲除“三股势力”的生存土壤和空间，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打，那些美好记忆的场景就能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道路上。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维吾尔族，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青年人怎么样，这个民族就怎么样。近几年，我们身边的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尼格买提、努尔艾力、西尔艾力、古丽米娜等等，他们在全国各种平台上为维吾尔族青年代言，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他们成功的背后，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青年朋友们，父母养育我们、国家培养我们，是期待着我们有所出息，有所作为。对父母的孝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能只停留在嘴上，更应该付诸实践，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学习，储备丰富的知识、练就生存本领，才能过上幸福生活，才能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人，赢得别人的尊重。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国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有义务学好国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求学就业经商机会，掌握现代前沿科技，通向世界，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维吾尔族文化。驻村期间，每当我走在乡间小道上，都会有村民让我帮他们翻译填写材料或解释生产生活产品的用法、协调生意来往等等，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时也往往会遇到语言的障碍。现在，他们学习国语的意愿非常强烈，我们开办的双语夜校每期都座无虚席，部分村民甚至站着听课，因为他们后悔在上学的时候没有学好国语，迫切的想把落下的功课补回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学国语？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未来。**睁开眼睛看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这样的国家。几经强权、宗教极端和民族矛盾的折腾，已经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数以万计的人们流离失所，在痛苦和饥饿中挣扎，在死亡和恐惧的边缘徘徊。这正是“三股势力”企图引诱我们的方向，难道这就是我们希望追求的生活和未来吗？看看我们站立的红色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政局稳定，社会秩序井然，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过着温馨安康的日子。我们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繁荣昌盛的国度多么的幸运。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殷切关怀，我们可能仍过着朝不保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更不用说接受好的教育、住在舒适的房子，享受好的医疗待遇。我们要认清谁是敌人、谁是真正的恩人，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抱有一颗感恩的心，时刻谨记党的关怀和恩情，沿着党指明的方向前进，追求属于我们的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

青年朋友们，我相信，可爱的故乡依然凝聚着无数人深深的眷恋，维吾尔族儿女爱这片土地依然爱得那么深沉。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新疆各族兄弟姐妹团结一心，一定能把我们的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新疆，我的家！新疆，我爱你！

## 守护家园：警惕“泛清真化”背后的阴谋<sup>1</sup>

吐尔孙·艾拜

清华大学博士生，自治区团校干部  
自治区团委驻和田县巴克墩村工作队成员

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挚爱新疆。对我来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那么珍贵，这里的发展变化又那么熟悉和令人欣慰。每当看到日新月异的故乡，心里无比振奋和自豪。因此，大学毕业后，我毅然选择回到新疆并参加“访惠聚”工作，现在在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驻村。

今年6月，在农民家走访时，村民给我说：因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他的儿子曾有一段时间以父母做的饭“不清真”为由，不在家吃饭，也不跟父母来往。后来，通过政府的教育和引导，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懊悔愧疚。老人紧握着我的手，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可能很多人觉得荒诞不经或不可想象，当时我也很震惊。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确实存在且不在少数。

还记得，新疆有些县市尤其是南疆的大部分县城都有“香港巴扎”的地方，也是80年代初-90年代末全城商品种类最为齐全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内地生产的商品。由于，群众对内地不太了解，所以将所有的商品误以为“港货”，巴扎也以此为名。这里是全县最繁华，各族群众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必去的地方。小时候，我家的大部分日常生活用品、服饰、零食和玩具都是从这里买的，也没有太多的顾虑，更没有那么多“清真”不“清真”之分。在学校周边的商店也不乏在内地生产的零食、饮料和各式各样的文具，深受我们的喜爱。

但是，与之呈鲜明对比的是，最近几年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各类商店和购物场所印有清真标识的商品越来越多了，不仅食品类商品印有清真标识，一些非食品类商品、服饰也打上了清真标识，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清真牙膏”、“清真肥皂”、“清真盐”、“清真纸”、“清真化妆品”等等。简单地说，“清真”的概念已经被曲解和利用了、被放大了、被泛化了。而且，这种蔓延趋势愈发严重，已经影响和干扰到广大维吾尔群众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没有清真标识的产品不敢买、不敢用、不敢吃的现象。

这种现象甚至蔓延到校园，出现部分少数民族同学以学校食堂做的饭“不清真”为由，不愿意在学校食堂吃饭；汉族学生在清真吃饭，有的少数民族学生有意见；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学生认为，海鲜类的食品“不清真”，歧视和排斥吃海鲜食品的学生等等现象。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聚集各族优秀青年的知识殿堂都出现这种情况，确实让人惋惜和忧虑，让我们不得不深思“泛清真化”背后是谁？为什么出现“泛清真化”现象？有何现实危害？如何正确认识“泛清真化”？

在我们的社会出现“泛清真化”现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部分群众对“清真”概念模糊不清，对“泛清真化”的现实危害认识不到位，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将其视为群众饮食习惯的尊重。因此，我想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澄清一些错误认识，携手共同抵制“泛清真化”

---

<sup>1</sup>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疆共青团”链接：[http://mp.weixin.qq.com/s/IJ4fB6tJSMFQf\\_TxtVIHYg](http://mp.weixin.qq.com/s/IJ4fB6tJSMFQf_TxtVIHYg)

的蔓延和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

1. “三股势力”是“泛清真化”的幕后推手。在社会上有些人以为企业在自己的商品打上“清真”标识属于纯粹的商业行为，是为了开拓消费市场，提高经济利润。这种说法在维吾尔族社会有一定的市场。的确，疆内外一些企业为了谋一己之私，利用群众朴素的宗教感情，对自己产品进行肆意炒作，恶意扩大“清真”概念，误导消费者，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更要看到，“泛清真化”现象的出现绝不是空穴来风，它是“三股势力”在新疆发起的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无硝烟的战争。

在新疆，“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从未停止过，为了实现他们的阴谋，不停地变换惯用方式和采取各种伎俩。在严打态势下，“三股势力”已成为过街老鼠，不能也不敢公然挑战和扰乱社会秩序。目前，新疆的稳定形势有向好态势，暴恐案件大幅下降，“三股势力”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但是，“三股势力”并不甘心失败，将分裂破坏活动从社会领域延伸到思想领域，将“泛清真化”作为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的新方式，与政府争夺群众的新途径，进行对抗的新手段。他们混淆是非，恶意扩大“清真”概念，向群众宣传极端思想。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农村，一些群众受到“泛清真化”的影响，不住政府修建的富民安居房，认为不清真；结婚时不领结婚证，认为不清真；不买内地生产的生活用品，认为不清真。甚至出现将政府修建的学校和清真寺也认为不清真，不到清真寺做礼拜、不让孩子上学的情况。这都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悲剧，“三股势力”通过“泛清真化”蒙骗和裹挟群众，进行软对抗，从事分裂破坏活动的罪证。

2. 宗教极端思想是“泛清真化”的源头。为了更好的服务少数民族群众，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管理部门对“清真”概念和“清真”标识的使用早已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规定。“清真”是符合群众饮食习惯的意思，并只限于食品行业，不含肉类、乳类及食用油成分的食品，不得冠以“清真”字样，非食品类的商品更不能印有“清真”标识。但是，“三股势力”伪装成虔诚教者，故意曲解“清真”概念，对其作出极端化、欺骗性的解读，不断扩大“清真”的范围，试图通过“泛清真化”控制信教群众，制造浓厚的宗教氛围，破坏正常社会秩序，也导致部分群众对伊斯兰教的误解。

驻村以来，我们的工作队在村里举办了多场大型文艺活动。起初，村民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几乎没有村民主动跳舞唱歌，有时候来都不愿意来。因为，这里的村民曾经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过宗教极端思想的侵蚀，形成了跳舞唱歌是不清真的怪论。前不久，一个村干部说：邻居认为他是党员，又是村干部，平时也不参加宗教活动，拿的工资不清真，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连续两年与他没有进行任何来往，一些村民对他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这都是“泛清真化”蔓延后的极端表现。“泛清真化”的实质是打着宗教的幌子、披着宗教的外衣、以宗教活动为借口的极端主义，背后是煽动宗教狂热和“泛伊斯兰主义”，源头是宗教极端思想。放任“泛清真化”就是为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渗透开路。

3. 制造民族隔阂和分裂祖国统一是“泛清真化”的险恶目的。一个暴徒在忏悔中说，原本他和家人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三股势力”利用他对教义的无知，经常给他讲关于“圣战”的事情，说只要进行“圣战”，死后就可以不受“审判”，直接进入天堂。在他们的蛊惑蒙骗下，思想上产生了实施暴恐的念头，误入歧途，现在为自己的罪行后悔不已。这并不是例外，为什么暴恐分子对手无寸铁的群众举起屠刀，滥杀无辜。因为，他们深受宗教极端思想的侵蚀。在暴恐分子看来，我们是“非穆斯林”或“异教徒”，是他们以“圣战”名义驱除的对象，是他们“升天堂”的传送门。近几年，在新疆发生的暴恐案件背后都有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子。“三股势力”借助宗教极端思想蛊惑人心，招兵买马，大肆鼓吹和宣扬所谓“圣战殉葬进天堂”的谬论，让受到蒙骗的群众成为他们的低级“炮灰”。他们通过“泛清真化”企图营造浓厚的宗教氛围，以此推动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为实施暴力恐怖提供滋生蔓延的土壤。他们把群众简单的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真穆斯林”和“假穆斯林”，排斥爱国宗教人士和部分信教群众，在不同民族、

信教群众内部、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制造隔阂，把信教群众当作他们实现分裂国家罪恶目的的工具。“泛清真化”绝不是一种商业活动，也不是对群众饮食习惯的尊重，更不是宗教教义的遵守，而是彻头彻尾的歧视其他民族和不信教群众，制造矛盾分裂国家的罪恶行径。

宗教极端与愚昧暴力永远是一对孪兄弟。“泛清真化”和宗教极端将我们的社会和民族引向痛苦深渊。我们维吾尔族同胞尤其是青年朋友们必须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看清“泛清真化”的本质，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青年处在人生的黄金时期，肩负着父母和家人太多太多的期许，有抱负，有理想，也有干一份事业的激情。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谨慎，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毕竟，国家培养一个优秀青年不容易，父母养育一个大学生更不容易。

**1.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坚决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青年是社会中最为活跃的群体，正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求知欲和探索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旺盛时期，涉世未深但又有较强的热情，所以更容易成为“三股势力”蛊惑蒙骗的对象。近年来，“三股势力”公然声称“宗教化、年轻化”的险恶目标，加紧对青年的思想意识形态渗透，妄图蒙蔽我们的青年成为他们实施暴恐的工具。青年朋友们，当我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读书，接受名师的指点和教诲，享受国家的奖助学金，过着安稳舒适的生活时，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谁给我们的？不就是这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吗？“三股势力”始终企图借助宗教极端思想玷污我们的家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引诱蛊惑我们的青年，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我们身边不乏被“三股势力”蒙蔽，误入歧途，毁掉前程的青年。父母期待我们有所作为，有所出息，他们脸上的一丝丝皱纹，头上的一根根白发就是对我们深深地牵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当前，偏听偏信“三股势力”的荒诞谬论，容忍他们将魔爪伸向社会？！这样的事党和政府决不答应，我们的父母决不答应，我们的青年决不答应。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是幸福的源泉，我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抵制宗教极端思想渗入玷污我们的家园。

**2.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的先锋。**由于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各族群众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文化上的共性大于差异性。“三股势力”以“泛清真化”、散布宗教极端思想和“圣战殉葬进天堂”等种种谬论，企图放大不同民族之间的习俗差异，进一步固化民族边际，强化民族意识，营造无形的隔离墙，在各族群众之间引起猜忌和矛盾，破坏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局面。我在内地上学时，当时全班就我一个维吾尔族学生，平时与老师同学的关系非常融洽，除了饮食习惯，其他方面从不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再看看我们的社会，各族群众一起工作学习，我们都有其他民族的同事和朋友，大家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什么差异了吗？其实，除了饮食习惯略微不同，也没有别的差异。我们身处在多民族、多元化的环境中，这是我们巨大的财富。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始终一起工作和生活，可谓形影不离、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很有必要相互了解，相互学习。但是，如果按照“泛清真化”的那套歪理邪说，我们各族群众就不能在一个餐厅、一个桌子上吃饭，甚至不能在一起工作学习。试问，如果我们饭都不能一起吃，工作都不能一起干，哪来的相互学习和交流？此外，现在部分维吾尔族青年存在乐于搞小团体小圈子，不跟其他民族青年交流交往交朋友，这些极端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一棵树的成长就是从周遭不断汲取能量的过程，一个人的成长同样也是从不同的食物汲取营养的过程，各民族的青年就是给我们提供必要营养的源泉。只有开阔胸襟，从他们身上汲取正能量，我们才能健康成长，我们青年应该成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推动者，越是“三股势力”企图破坏民族团结的时候，我们越要团结一心，维护民族团结。

**3.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成为崇尚现代文明的典范。**我们常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就是只有与时俱进，才不会被淘汰，一个人也一样，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也一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各自特有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这都是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但是，就因为它是长期的实践积累，所以难免出现陈旧、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内容，需要我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些内容当时是符合实际的、先进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移已经过时了，不符合时代要求了，需要毫无保留地摒弃。“泛清真化”的作祟者们号称自己按照所谓的“教义”行事，还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他们不仅自己曲解教义，还歧视和排斥无辜群众。仔细想想，要以 1000 多年前的教义规范我们的一切生活，可行吗，明智吗？更何况“泛清真化”本身就是对教义的曲解。我们要知道，宗教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全部，不能涵盖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更不能作为一个民族的标识。客观的讲，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对教义的刻板理解已经成为我们维吾尔族发展进步的障碍，那些紧紧抱着教条不放、曲解教义的人已成为我们进步的绊脚石。青年朋友们，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一个人、一个民族永远不能置身于现代社会之外。我们要紧跟时代的步伐，打破思想的禁锢，跳出那些条条框框，敢于批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引导我们的社会崇尚科学，崇尚文明，向前发展。

同胞们，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怎么样，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会怎么样。我们要准确认识“泛清真化”的危害及其背后的阴谋，澄清思想上的一些错误认识，避免“泛清真化”和宗教极端成为我们进步的障碍。

## 双双清华硕士毕业 90 后维吾尔族小夫妻南疆驻村、宣讲的心里话<sup>1</sup>

艾斯喀尔·亚森（自治区团委学校部）  
苏毕奴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组织人事处）

我叫艾斯喀尔·亚森，出生成长在莎车县，2003 年考上内地新疆高中班，后来又考上清华大学，取得了工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我爱人叫苏毕奴尔，来自边陲小城博乐，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在清华取得文学硕士。来自天山南北的我们相识相爱在美丽的清华园，在清华双双取得硕士学位以后一起回到了家乡。目前，我在自治区团委学校部工作，苏毕奴尔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组织人事处工作。

新疆是多民族聚集地，在我们的记忆里，各民族小伙伴一起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我们共同学习，共同生活，时至今日，仍然互相关怀、情谊绵长。在那样安定祥和的年代，各民族同胞情同手足，和谐融洽，我们从未感受到自己与周围的伙伴有什么不同。走出新疆，来到内地求学，我们努力融入学校集体，深受老师同学的恩泽和母校的关怀，也并未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特殊的面貌特征，让我们极易吸引周围人的目光，无论我们的优点还是缺点都会被一定程度放大，并与“维吾尔族”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比较陌生的名词联系在一起，当时的我们认为自己就是维吾尔族的代言人，因此格外注意一言一行。然而，随着新疆一系列暴恐事件的发生，恐怖势力的魔爪也伸向了内地。当时每每发生暴恐事件，跟所有在内地求学的新疆孩子一样，我们就抬不起头，当时身边的汉族朋友都说，通过我们认识了真正的维吾尔族是什么样的，维吾尔不等同于恐怖分子，让我们内心感到特别温暖。这段经历对我们冲击很大，当时我们就想我们需要反思的时候到了，因为我们维吾尔青年怎么样，这个民族的未来就会怎么样。母校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激励着一代一代清华人。我们深知家乡与内地还有巨大差距，家乡人民的生活还不安定，新疆的局势还很棘手，这些不都正好说明新疆就是最需要清华人的地方吗？作为党和国家培养的少数民族学生，我们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工作。听说我们要回新疆，在清华的同学都非常的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北京将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同学们不知道的是，新疆需要我们，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努力为家乡正名、为维吾尔族正名。

回到新疆后，恰逢自治区开展“访惠聚”工作，我和苏毕奴尔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6 年先后参加驻村工作，并于 2016 年 7 月在苏毕奴尔驻村期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我在和田县，她

<sup>1</sup> 文章来源：“新疆共青团”微信公众号，文章链接：[http://mp.weixin.qq.com/s/Pb2F9No\\_kSBYy8bb32FSjw](http://mp.weixin.qq.com/s/Pb2F9No_kSBYy8bb32FSjw)

在疏勒县驻村工作。在驻村期间，我们充分发挥自身双语优势，转换角色、转变心态，积极融入群众。我们结合自己的成长和求学经历，向农村青少年潜移默化地传递“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主动了解基层青少年的所思所想，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大家都说“基层是年轻干部成长的肥沃土壤”，刚走出校门不久就走到基层，我们感到很幸运。我们还经常说起基层才是全中国最好的“大学”，我们能够向基层干部学习，掌握解决群众问题的方式方法，体会什么是理论结合实际，学会什么是群众语言，相当于在这所“大学”读了个“博士”。今年3月，我有幸成为自治区共青团“民族团结一家亲”大宣讲活动的宣讲团一员，以自治区团委书记阿依努尔·买合赛提同志牵头撰写的《五问维吾尔青年》等文章为宣讲内容，面向南疆维吾尔族青少年开展宣讲。在近两个月宣讲过程中，我有幸前往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26个县市、100多个乡镇与基层维吾尔族青年面对面交流，受益匪浅，感触颇深。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与苏毕奴尔在驻村和宣讲期间的一些体会。

**一、维吾尔族群众渴望社会稳定，意识到了社会不稳定人民群众就是最大的受害者。**在我驻村的和田县塔瓦库勒乡，青年外出务工比例很大，其中有很多去内地售卖和田大枣、核桃的。近年来，新疆多次发生由“三股势力”煽动的暴力恐怖事件，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塔瓦库勒乡青年也明显受到了影响，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内地各族同胞对新疆籍人员，尤其是对维吾尔族态度的变化，他们的生意受挫，在内地租不了房子，失去了赚钱机会，不得不回村里，这些青年非常痛恨那些影响他们生意的暴恐分子。他们渴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渴望过上安定的生活，教育好下一代。

**二、维吾尔族群众渴望教育，开始意识到“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南疆长期存在一个特别让人痛心的现实，有些群众不重视孩子的教育，他们对孩子就如同管理自己的庄稼一样放任自流，庄稼自然生长，孩子也自然成长。庄稼没长好来年可以再种，但是耽误孩子的教育那就无法挽回。农村孩子渴望教育，但是无奈于盛行的“读书无用论”，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初中毕业就离开学校，早早嫁人，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就为人父母的现象屡见不鲜。

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多让人特别欣慰的变化，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南疆教育事业，推行15年免费义务教育，对口支援省市大力支持，每个村都建立起了幼儿园，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支教老师深入基层支教。宣讲过程中，每每走进校园，我都感慨万千，自己2003年远离家乡在内高班就学时的优异的学校环境、教学条件，现在我的弟弟妹妹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最让人欣慰的是家长们开始注重教育了，孩子们回到学校了。苏毕奴尔在疏勒县驻村期间，在幼儿园搞活动时问过一个小朋友“家里好还是幼儿园好？”小朋友回答“当然是幼儿园好，家里可不能天天吃上鸡蛋和牛奶”。小孩的回答是那么的质朴和可爱，但同时说明免费学前教育让孩子们得到了良好学习生活条件。

我在皮山县桑株镇的一个山村里宣讲完，一名青年握着我的手说《五问维吾尔青年》说出了他长久以来想说不敢说的心里话，听完很有共鸣。他说维吾尔族面临的种种问题终究会通过教育来解决。他很自豪地说他们这个山村出过20多名大学生，目前在县城和桑株镇各岗位上工作，还有十几名在读大学。他的一举一动透露着自豪，他对桑株镇的未来充满信心，“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基层群众心中正在生根发芽。

**三、维吾尔族群众向往现代生活，却缺乏引导；向往与各民族同胞交流交往，却无奈于语言上的障碍。**我们驻村时组建了一支女子学生篮球队，刚开始女孩子们害羞，不太愿意来，到后来慢慢喜欢上了打篮球，放学后来村委会训练，训练结束也不愿回家，因为回家面临着繁重的家务活，也无法安心学习，在村委会打篮球是她们最开心的事情，这里有舒心的学习和娱乐氛围。农村青年，尤其是女青年非常渴望现代生活，渴望接触新鲜事物，但是长期以来缺乏平台，也缺乏引导，其实只要有舞台，她们就会发光。我们驻村和宣讲时感受到南疆维吾尔族群众因为有结对子的汉族亲戚而骄傲，他们非常期待亲戚们来串门，期待与亲戚交流交往，但却被语言的屏障所

阻隔。我们意识到互相学习兄弟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我们父辈一代、甚至我们这一代由于没有做到这一点，而影响了各民族间交流交往，我们不能再让语言成为各民族兄弟姐妹沟通的障碍。我们要让我们的后代从小玩在一起、学在一起、成长在一起。

我们想对维吾尔族青年朋友说：

**我们要有感恩之心。**有“国”才有“家”，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的强大和稳定是我们的福气。祖国母亲为我们挡风遮雨，呵护我们，养育我们。但是我们的部分青年却把这一切都当做是理所应当的，没有最起码的感恩之心。你们知道祖国母亲的爱有多么伟大吗？我在皮山县克里阳、桑株，在策勒县奴尔等乡镇宣讲时看到这些山区乡镇整齐划一的抗震安居房，通畅无阻的柏油马路，甚至每所房子屋顶上热水器都是统一购置给农民使用，这些是最直观的感受。当时我就想，要不是党和政府为这些山区群众着想，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生活在城市里过着富足安定生活的大多数青年能够关注到在离策勒县城 120 公里的昆仑脚下还有一个奴尔乡吗？关心山区兄弟姐妹的生活吗？估计几乎没有人关心，但是祖国母亲时刻关注着，时刻关心着，在祖国母亲眼里，她的孩子一个都不能落下，前进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不管我们在哪里，祖国一直牵挂着我们，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啊！乌鸦有反哺之意，羔羊有跪乳之恩，青年朋友们，我们也要有感恩之心，我们要懂得报答祖国母亲的养育之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们要知道，我们并不特别。**我们是维吾尔族，同时我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跟其他民族的同胞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我们总认为自己的习俗应该被尊重，而很少有人去了解周围其它民族的同胞有什么样的习俗。甚至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又有几个维吾尔青年能主动去了解、学习从而热爱中华文化？我们对于自己受到的优惠政策置若罔闻，却对生活中其他民族的无心之举过分敏感，认为被特殊对待。其实，处理好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要是有一方搞得自己很特别，总要求对方尊重自己，一切以他为中心，只看到自己的优点，放大对方的缺点的话，会让对方反感，更别说建立友谊了。以诚相待，以心交心，才能搭起真诚沟通的桥梁，才能打下团结友谊的基础。加强民族团结，关键在于真诚，在于沟通。如果我们维吾尔族青年每个人都敞开心扉，主动了解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少一些猜疑，多一些包容，就可以弥合裂痕，让石榴籽们抱得更紧一些。

**我们要知道我们肩上的责任。**青年朋友们，你们认真想过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是为了什么吗？就是为了你我他的安宁日子，实现总目标就是为了让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抬头，不让他们骑在我们头上，不让我们沦落到叙利亚、阿富汗民众一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痛境地。总目标说白了就是为了守护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守护每一名天山儿女的笑容。要知道，实现总目标是我们每名维吾尔族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自觉把个人的成长进步同总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积极支持、理解和配合当前依法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措施，自觉肩负起自己的青春责任。

青年朋友们，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正是我们的新疆，我们怎么样，新疆便怎么样，我们是什么，新疆便是什么，我们肩并肩，天山将更加雄伟，我们心连心，塔里木将更加清澈，我们有光明，新疆将充满阳光！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244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